

# 蘇俄文學的中學男女

周起應譯



一九三七年



蘇俄文學中的男女

周起應譯

1937



3 0406 2643 8

圖登記 50914 號

目 次

新俄文學與新興階級	2
新俄文學與知識階級	34
新俄文學與農民	60
新俄文學中的 NEP 與康閔立斯特	85
新俄文學中的再建與工場勞動者	95
新俄文學中的官僚與專家	104
新俄文學中所反映的一九二一年 後的知識階級	115
新俄文學中所反映的一九二一年 後的農民	131
新俄文學與新的富農	139
新俄文學與農村的酵母	144
新俄文學與文化戰線	156
新俄文學與家庭戰線	178
譯者附記	202

# 新俄文學中的男女

1918

新俄文學 與

## 新興階級

---

俄國無產階級當作一個階級意識的社會羣，當作一個集團主義的理想的負擔者而擡頭，是比較晚近的事，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的事。巨大的勞動階級的形成，農民從奴隸的農村的“靈”（農奴）逐漸地轉變到“自由的”工場勞動者，是由於落後的產業革命和農村的俄國的漸次都會化的結果，隨着資產階級的勃興而發生的不可避免的現象。在一八一二年，都市僅僅包含着帝國全人口的百分之四；在一八五一年，百分之七；在一八七八年，百分之九；在一八九八年，百分之十三。在一八六〇年，祇有一五·〇〇〇左右的工業企業，所使

879.2  
814.3

用的勞動者也不過五十萬多一點；但到一八八七年，企業的數目便增加到三〇・八八八，而勞動者的數目也增加到一・三〇〇・〇〇〇；而在一八九七年，僅僅十年以後，便已有三九・〇二〇的企業，使用着二・〇九八・二〇〇的勞動者。於是，投機商人，公債契約人，工業資本家和銀行家迅速地篡奪着威嚴和名譽的地位，他們的佩着寶石的太太們開始由破落的貴族和貧窮的皇子護衛着，而出現於劇場和公共的宴會，他們的奢華的但是不雅致的邸第開始在首都的唯一無二的街道上聳出着牠們的華美的屋頂，同時，在遠遠的郊外，在噴着氣的煙囪的豫兆的陰影下，日益增加的污穢的男人，憔悴的女人和蒼白的小孩之羣，正在爲新的工業的和商業的中流階級堆積更多的財富而日夜不停地勞動着。

被榨取得麻木不仁，貧窮不堪，勞動者在最初是不能夠提出甚麼反抗的。但是漸漸地他們開始



79465



團結起來，到一八九六年，就有二九·〇〇〇以上的勞動者在一一八個不同的企業內舉行罷工。在同一年，牽動了三〇·〇〇〇的勞動者的聖彼得堡的織物工業的大罷工發生。在一八九七年，有一四五處的罷工，而在翌年，則有二一五處。勞動者漸漸地有了階級意識，而且一天一天地傾向於革命的思想了。勞動階級正在成爲一種社會的勢力；牠吸引了直到那時爲止徒然地把注意集中於農村的那些革命的知識分子。標榜馬克思主義的定期刊物和書籍開始出現。勞動階級本身也變得愈益旗幟鮮明；牠發展了牠自己的知識分子，牠自己的指導者，作家，詩人。不再僅僅被反映在大半由人民派所支持着的中產階級作家的作品中，勞動者現在開始在他們自己的文學中表現他們自己。從舊社會的子宮中，無產階級的文化和無產階級的文學的胎珠開始生長着。

但是在我們討論由他自己所表現於他自己的

作品中的無產階級之先，我們不妨爲了比較和對照的原故來檢討一檢討被反映在由中流和上流階級所創造的而且爲他們而創造的文學中的無產階級的姿態吧。關於這點，我們必須記住下面的事，就是，到十九世紀中葉爲止，俄國的文學差不多完全是出於地主貴族的分子之手，直到將近十九世紀後半，那時正在擡頭的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代表者纔開始打進文壇，至於從下層深處發出來的第一聲開始響過小路，攻打俄國的藝術的象牙之門，那簡直是九十年代以後的事了。除了一二個八十歲的老人——託爾斯泰 (Tolstoi)，菲特 (Fet) 等——而外，文學上的貴族的霸權，在無產階級尙未發展成爲一個重要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因素以前，已經實質地崩潰了，所以，這是很自然的，在早期的文學中，勞動者的型或是完全缺如——如在查柯夫斯基 (Zhukovski)，普希金 (Pushkin)，萊孟德夫 (Lermontov)，歌郭爾 (Gogol)，菲特，替

契夫(Tiutchev), 託爾斯泰的作品中——或是僅僅偶然地提及, 而且並不與以十分的同情——如在屠格涅夫(Turgenev), 龔察洛夫(Goncharov), 赫爾岑(Herzen), 格里郭羅維基(Grigorovich) 的作品中。

如前面所述, 在一八六〇年, 俄國已經有了一五·〇〇〇的工業企業, 但是就在四十年代, 有些眼光較遠的地主們, 爲了要救他們自己於滅亡和要利用那些他們沒有充分的土地去安置的農民們, 便已開始效法西歐, 在他們的土地上建立工場。例如, 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說“伊戈夫”(Igov) 中, 龔察洛夫在他的小說“一個平凡的故事”(An Ordinary Story) 中所述及的, 便是這樣的工場。在這兩篇小說中, 都沒有描寫着勞動者。龔察洛夫祇是漠然地說出在玻璃工廠裏, 勞動者們被“鞭打着”, 當他們“開始輕舉妄動”的時候, 而屠格涅夫則使他的漁夫的農奴爲了沒有被投身在一個製紙工廠裏, 而

感謝上帝，在那工廠裏，一個和他同樣的老人做挑水的工作累得要死。但是格里郭羅維基卻在他的小說“漁夫”(Fisherman)中給了工場勞動者查卡爾一個比較精密的描寫。

像農奴解放前大多數的同時代的作家一樣，格里郭羅維奇也專注意於農民。農民被歌頌着而且被詠歎着。他是一個哲學者而又是一個詩人，他是一個在他的每句言語裏輝耀着關於土地的豐富知識的真正俄國人。勃興的都市和工場將要把農民從他的詩的田野和森林引誘到工場的罪惡和醜惡裏去。機械給與農民勞動者一種墮落的影響，而農民勞動者，當他回到農村去的時候，又依次地給與其他的農民們一種墮落的影響。在農業的，貴族的，家長制的環境中，自由的無產階級簡直是一個新奇的而又可惱的現象，這現象，照格里郭羅維奇說起來，是“正在不幸地隨着工廠數目的增加而愈益蔓延”。真的，查卡爾是直言的，傲慢的，自信

的，而且有一點兒喜歡譏笑和輕蔑。毋怪乎常常同情於謙卑的而又知恩的農民的這位仁慈的，溫文爾雅的格里郭羅維基，對於查卡爾的那種特別傲慢的態度有些憤慨，而把他當作一個惡漢，當作農村牧歌的甘美的雲圍氣的一個破壞分子。就是赫爾岑，西歐化了的，革命的赫爾岑，當他在他的一封信裏用如下的意義深長的話談及查卡爾的時候，也曝露了他自己是一個典型的，反動的地主貴族。他說：“現在，在“漁夫”中出現的敵人是個內部的，家庭的敵人：這是一個完全新的鬥爭的開端——耕田種地的，溫順的，單純的家長制的農民與在都會裏，工廠裏勞動着的，過着一種可咒詛的，無所顧慮的生活的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

赫爾岑之所以能夠明顯地豫見到俄國社會的終極的分化，無疑地，是由於他在工業的英國和其他西歐各國住過很久，在那裏，無階產級早已成爲

了一個明確的經濟的階級，和一個明確的社會思想的代表者。在俄國，無產階級還不能夠明確地和農民區別。當一個農民到伏爾加河畔去做勞動者或是到烏拉地方去做鑛夫的時候，他並沒有切斷他和農村的連繫。常常地，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和兒女還是留在鄉村裏。農民勞動者的夢想就是蓄下幾個盧布去納稅或是買一匹馬和早一點回到故鄉的土地去。無論在主觀上或是客觀上，普通的俄國的勞動者都不是完全的現代的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因此，除了熟悉西歐情形的少數作家外，大部分的作家都不能夠在勞動者與農民之間劃出一根明確的境界線，而祇使用着“人民”這個曖昧的一般的名詞，這個名詞，在他們看來，是和“農民”同意義的。“人民”痛苦着——在農場上，在鑛山裏，在河畔。

在從事於文學事業的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看來，俄國的最可憎惡的東西是專制政治。他們正在

夢想着一個以自由的和繁榮的農民為基礎的民主主義的俄國。在農民中，他們找着了他們的自然的同盟者。人民派的運動就是這樣勃興的。甚至到後來，當社會主義的思想開始浸入俄國，無產階級開始增加數量的時候，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還是把他們的希望繫於農村。他們，像赫爾岑一樣，以為工場對於人間的個性是有一種墮落的影響的。

但是，大體上，勞動者，也和農民一樣，在最初是當作一個不是因為樂天知命而是因為要從生活的令人發狂的單調和勞苦中尋求解脫的原故而沉湎於酒的，酩酊的，被威脅的，被榨取的個人，而被描寫着。“當一個人甚麼都不感覺了的時候，那就好了，”在列塞特立柯夫(Reshetnikov)的一篇小說中的一個勞動者這樣地叫着。“但是要知，你這蠢豬，你！”在烏斯倍斯基(Uspenski)的一篇小說中的一個金屬勞動者這樣地對他的妻說，“你的丈夫是不是一個酒徒呢？我祇要喝到使我的心安靜

下來就夠了呀。”

直到七十年代以後，我們纔偶爾遇見勞動者的瞬間的姿態，那姿態無可置疑地證明了勞動者已不再祇是一個農民的複製物，而是正在開始發展着一種全然不同的個性和一種對於人生的明確的無產階級的態度。“土地耕作者的那懶洋洋的，遲鈍的，卑屈的步調已經讓位於工場勞動者的那迅速的，活潑的，挑戰的步調了。在這裏再也看不見畏怯的動作和僵硬的背了。在人們的面孔上再也看不見阿諛的，奴隸的謙卑了；一切都似乎是很直率的，坦白的，剛強的。”——茲拉託夫拉斯基 (Zlatovratski) 的“放浪者”(Wanderer)。這一段文章是在一八八四年寫的。但是就在一八七〇年，在非奧託羅夫·阿繆列夫斯基 (Fedorov-Omulevski) 的“一步一步”(Step by Step) 的一章裏，我們便已看見了覺醒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潛勢力在俄國文學中的最初的通知。國營玻璃工廠的新經理增加勞

動時間，減低賃金，而且鞭打鬧事的勞動者。勞動者忍無可忍，而且被兩位變裝的知識分子所煽動，終於反叛起來。經理被鞭打，哥薩克兵被擊退，勞動者畢竟獲得了一次勝利。

工場勞動者的覺醒以及他們對於由人民派的知識分子在他們中間所領導着的秘密的教育事業的那熱烈的反應，也被描寫在斯坦留柯維基 (Staniukovich) 的“沒有逃路”(No Escape——一八七〇)中了。

漸次地，勞動者開始帶着更加明確的，個人的容貌了。在這裏和那裏，而在九十年代以後尤為顯著地，賦有少許的階級意識，附和革命的宣傳，積極地參加秘密的組織，渴慕知識和適當的生活的工場勞動者，開始出現於柯羅連科 (Korelenko)，庫布林 (Kuprin)，波波立金 (Boborykin)，惠萊沙哀夫 (Veresaiev)，綏拉菲莫維奇 (Serafimovich)，高爾基 (Gorky) 諸人的作品中了。就是流氓無產

階級也被高爾基加以浪漫的超人的種種的裝飾而昂然驕步地登上舞臺了。對於農民的讚美開始消失。蒲寧 (Bunin) 的“農村” (Village), 柴霍夫 (Tchekhov) 的“農民” (Peasant), 高爾基的“傑爾卡西” (Chelkash), 通通是知識階級對於農民的非常失望的表示。他們所描寫的農村是困惑的, 殘忍的; 農民是自私自利的, 愚蠢的, 兇惡的。顯然地, 照他們看來, 未來的英雄是都市的無產階級。

但是, 知識階級心中對於勞動者的混亂的觀念, 以及他們描寫勞動者時所常有的曖昧的態度, 是有一個客觀的原因的: 無產階級尚在一個萌芽的階段, 牠還不能夠明顯地和農民區別。實際上, 勞動者常常把自己看做一個農民, 把農村看做他的正當的家庭, 把農作看做他的本來的職業。城市是流放地; 工場是一時的監獄。在最初的俄國的無產階級的文學的每個辭句中鼓動着的, 就是對於大地的強烈的芳香, 對於家畜的可樂的親近, 對於

軋軋地響着的水井和收穫時的歡喜的那懷鄉病的  
低音調。

我被逼迫地離別了我的家庭，  
我的自由的田野，  
我的生命正消磨  
在奴隸制度的束縛下，

休克萊夫 (Shkulev —— 一八六八年生)，一位初  
期的無產階級的詩人，這樣地叫苦着。他渴望回到  
農村，草舍，他的妻子，和他的兒女們那裏去：

回到農村，回到自由去，  
回到我自己的小小的草舍去，  
回到我的親愛的小小的妻孥，  
我的成羣的兒女們那裏去。

但是和這種陰鬱的調子混合着，有時候可以聽到一種英勇的反抗和無產階級的團結的調子。

“我們是人，不是畜生，不是不能做聲的動物……”尼契葉夫（Niechaiev——一八五九年生），無產階級詩歌的祖父，這樣地寫着。而休克萊夫則更威脅地侮辱着有錢有勢的人：

我不是來乞食的，  
不要把麵包當作施捨物來給予我吧；  
像我這樣的人不知多少——  
我們都是很強的，這個你應該知道。

稍後，顧米列夫（Alexei Gmyrev ——一八八七——一九一一）暫時忘記了他的憂鬱，激發了對於他的階級的信念，而大聲疾呼：

忍着痛苦，不要喪失勇氣，

懷着對於勞動階級的信仰，  
準備着決一死戰。

漸次地，對於“惡的命運”，“孤苦的幼年”，和失去了的田舍的樂園的那無限的悲歎開始退到最後的地位了。心理的衝突在當作人類的解放者的無產階級的眺望中被解決了。

隨着二十世紀來了革命的騷亂，罷工，政治結社，可恥的日俄戰爭。年青的無產階級的巨人開始意識和誇耀他自己的力量；鐵鎚握在手裏，他準備把舊的秩序打成粉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勃發了。雖然終於被鎮壓下去，然而流產的革命，鐵路勞動者的罷工，聖彼得堡的勞動者蘇維埃，莫斯科的防寨——這一切的雄壯和哀感，在勞動者的想像中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而且給了他們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之心理的準備。

十月革命使無產階級擡頭了。從商店和工廠，

從製造所和郊外，勞動者，現在澈底地覺悟了他們所必須遂行的任務，開始向着權力前進。站在一切戰線的先頭，在一切戰爭中領導着，抵抗着反革命和外國的侵入，勞動者爲了他們的經濟的解放和政權是經過了很大的犧牲的。破壞舊的，壓服敵對者——這就是康閱立斯特的無產階級的最初的任務。這需要着決心，鐵的紀律，對於過去的不可遏止的憎惡，而，最要緊的，對於無產階級的終局的勝利的燃燒着的信心。在這個劇烈的生活，劇烈的鬥爭，和劇烈的死亡的時代，沒有憐憫，沒有溫和，沒有懷疑。

“一點也不顫慄，”里別定斯基（Libedinski）的小說“一週間”（A Week）（譯註：蔣光慈譯，北新版；江思森譯，水珠版）中的布爾雪維克蘇里珂夫說，“我親自執行着這些死刑，而這都是因爲我確定地知道……這雖是一條血路，但這是一條從支配着全世界的人們的生活的恐怖中解放出來的唯一的路。”因

此，和許多其他的同志一樣，蘇里珂夫也“憐憫人們，而且爲了他們的痛苦而痛苦，但是他知道祇有從革命的敵人的死亡中纔能達到康閱立茲姆的大道。”所以他是非常殘酷的。“我已經，”他說，“把我的偉大的憐憫化爲了偉大的仇恨。我想這是每個康閱立斯特所應該做的。總有一個時候，而且我希望牠快到來，這個偉大的人間的憐憫會使得世上的人們的生活更爲美麗。那時候，他的鄰近的人的痛苦會使得他也感到痛苦。人們會非常珍重地看待着別人的有機體，像你的和我的一樣地被構造着的，而且一樣地痛苦着和被傷害着的那美麗的人間的身體。那是一定會這樣的。但是，在現在，這個憐憫卻不能不變成仇恨。”

蘇里珂夫一樣的人們，康閱立斯特們，無產階級的指導者們，在俄國的壓倒的農民的人口中占着差不多極小的少數，但是因爲革命的團結和目的確定，他們成爲了把一切不成熟的分子吸引

着的核心。他們是無情的，警備的革命的先鋒隊，在他們的後面，進行着無數百萬的勞農大眾。從飢餓和疾病中，從煙和火中，從他們自己的和別人的血的河流中，勞動者，布爾雪維克奪取了而且保持了他們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權力。力，布爾雪維克說，無論何時何地都是在火和焰的鍛冶場裏鍛冶出來的；當牠冷了的時，牠便和鋼鐵一樣地變得堅硬，銳利，牢不可破了。“我們是無敵的；我們，我們，我們是無敵的，”勞動者安特羅立珂夫——見阿洛塞夫（Arosev）的“列甯”（Lenin）（註譯：葉靈風譯，“領袖”，載“新俄短篇小說集”，光華版）——在回憶列甯的煽動演說的時候這樣地重複着說：“手牽手地…抱着一個共同的思想…更高更高地…更加勇敢地…”

這就是我們在那敘事詩的時代的文學中所見到的勞動者，所見到的布爾雪維克。『鮑皮涅克（Boris Pilniak）的話講起來：“這些穿着皮短襖的人們個個都是母親的兒子，這些皮的美少年；個個

人都很強壯，一叢頭髮從帽子下面垂到頸上；個人的皮膚都堅韌地緊包着顎骨，嘴唇緊閉着；動作是直率而堅決的。他們是“軟弱而笨拙的俄國民衆中的優秀者。”沒有甚麼東西能夠挫折他們的銳氣。“這個我們知道，這個我們需要，這個我們已經決定——毫不退縮。”“努力地活動着，”皮涅克叫着，“這就是布爾雪維克的精神…”（譯註：葉靈鳳譯，“皮的短衫”，載“新俄短篇小說”中；傅東華譯，“皮短襖”，載“村戰”中，新建設版）

這樣的引證可以從一百個不同的作家增加到一百倍，但是本質上他們所描寫的人物卻是一個模樣的：“努力地活動着”的鐵的男子。

自然，並非每個布爾雪維克都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或甚至無產階級出身，但是要在勞動者和從其他的階級出身的康閱立斯特之間劃出一根境界線卻是很困難的，後者是那樣地同化於勞動大眾的精神和意識形態了。勞動階級內的不活動的分

子，爲數雖然很多，在當作我們現在正在研究着的這巨大的變動中的要素來看，是無關輕重的。至於無產階級的前衛部隊，創造的革命家——這些和布爾雪維克是完全一樣東西。勞動者和布爾雪維克在這裏被當着同義語使用着，也就是這個意思。

在左祝梨(Efim Zozulia)的“不過一點兒小事”(A Mere Trifle) (譯註：傅京寧譯載“村談”中)中的布爾雪維克別立柯夫是當時的文學中的典型的無產階級英雄，他一個人站在空虛而光亮的臺上，向持着刀，炸彈，和實彈的來福鎗的那懷着敵意的白黨的遊擊隊演說。對於勞動階級的勝利的確信成爲他的這麼一個有機的部分了，他“帶着有機的信心，一點哀感也沒有地，而且帶着好像他是在講着極其平常的事業一樣的神氣，講着人類的最崇高的事業；一個人祇要用意志去忍耐，而目的是會達到的，而且是一定會達到的……從關於社會主義的最後目的的話談到關於土地的分配，動員，逃兵，

流刑，等等問題，在他是簡直算不了甚麼一回事。當他講着這些話的時候，這些話聽來似乎是極其熟悉，然而又異常地新奇，而最後似乎又很簡單，是大家都能夠經驗得到和理解得到的。……”標語就是：“一切都要充軍，一切都要上前線去！一切都要改造——”無論何時，“一切”在他的嘴唇裏說出來是這麼地自然，假使在他說話的時候，他隱諱一些甚麼，那反而會顯得不自然了。這就是由一個康閱立斯特的勞動者所表現出來的革命的精神。帶着何等的自負，他開始他的演說：“同志們！為世界革命的先驅者的這偉大的榮譽落在我們的身上。我們是最先從沙皇，地主，資本家，將軍，和憲兵的束縛下把自己解放出來的……”為世界革命的先驅者的這個自負心在飢饉，內戰，和產業的停滯的那最困難的時期中支持了多少的動搖分子呵。

浸透於革命之初期的，英雄的時代之無產階級的詩歌中的，就是這種自負和歡喜的氣分。

我們是最先起來的，  
我們是最先勇敢地前進的，  
在緊緊地排着的隊伍裏，  
響應着新的時代的呼聲……

無產階級詩人沙多維夫 (Sadoviev) 在一九一八年這樣地歌唱着。

我們是將要到來的新穎的美麗的世界的先驅者，  
我們是進軍，我們是魅惑的時代的氣息，  
我們是心臟，我們是勞動者的心，他們的最美麗的花，  
我們是世界的團結，我們是勞動者的偉大的夢。

梅雅珂夫斯基 (Vladimir Maiakovski)，在莫

斯科的赤色街上現出他的巨大之姿，向行進着的  
勞動者大聲叫喊，也就是在那個時候：

叛逆的進軍在街上橫行，  
驕傲者的頭顱掠過，  
我們，第二次諾亞的大洪水，  
將好像爆發的霧一樣洗滌這世界。

日子是燦爛的駿馬；  
年歲抑鬱地過去；  
我們的偉大的神是速度！  
我們的心臟是轟轟的大鼓！

甚麼東西能比我們的色彩更豐富？  
我們難道會被鎗彈的鋒芒擒住？  
我們有歌曲，水槍，水壩鎗與刺刀；  
我們的黃金就是我們的高響的聲音！

綠色的草地生長着，  
日子驟然地過去——  
虹呵，彎着你的弓吧！  
急匆匆的馬，飛奔吧！

看我們頭上的天空中的星星，  
沒有他們的彎勁，我們的歌也還是會一樣地  
旺盛：  
咳！大熊星在要求  
我們活活地登上天去！

歌唱吧！飲酒吧！  
我們的血管裏流着青春！  
跳吧，心臟，跳吧！  
黃銅的胸呵，歌唱吧！

——約塞夫·佛里門(Joseph Freeman)譯——

二十二歲的勞動者亞歷山大羅夫斯基 (V. Alexandrovski) 在一九一九年這樣誇耀地寫着：

我們捲起了一陣迅速的風暴，  
用我們的鋼鐵裂開了大地……

而且鼓動着他的靈魂去“更大聲地叫着，”並且去  
“刺激那些醉生夢死者的神經……”

二十二歲的倍茲敏斯基 (Alexander Bezymenski) 充滿着歡喜地向宇宙 (Cosmos) 突進：

我是太陽和鋼鐵和三和土，  
我的父親——宇宙的非人格的創造者。  
在工場的子宮中，在機器的心臟下，  
我被孕育和產生——是的，我是一個勞動者！  
我的第一個動作——鐵鏈的揮舞！  
我的第一瞥——曙光的面孔，

我的第一聲——雷的轟轟，  
宣告着偉大的十月的誕生！

和這些一般地以革命的歡喜和誇耀為主題的詩歌並行着，現在又常常地聽到另一種的主題，那種主題在內容上更加特別地是無產階級的，更加具體地暗示了康閱立斯特所想像的勞動階級的終局的使命。“我們是先驅者……我們是心臟……我們是心靈……我們是世界的團結……我們捲起了一陣迅速的風暴……山和海也不能阻住我們，”等等，等等——老是我們，我們，我們的……就是倍茲敏斯基的“我”也不外是一個集團的“我”——當作勞動階級的具體表現的“我”。

革命初期的無產階級詩歌的這種特質是不能過高地被評價的。牠的最完全的表現可以在基里洛夫 (V. Kirillov) 寫於十月革命以後不久的那首題名“我們”(We)的詩中看出。

我們，這無數的，可畏的勞苦大眾，  
我們征服了海洋和陸地的廣大的空間，  
用我們所製造的太陽照耀大的城市，  
用反抗的誇耀的火焰燃燒我們的靈魂。

我們的眼淚沒有了，我們的溫柔被忘記了，  
我們不要紫丁香花和青草的芳香，  
我們讚美電氣，蒸汽和炸藥，  
發動機，號笛，鐵和黃銅……

我們的靈魂同化於金屬，我們的機器的一部  
分，  
我們不曉得期望和夢想天空。  
我們要在這地球上來尋求快樂，  
來養活一切飢餓的人，來止住他們的長聲的  
哀號……

哦，詩人和唯美主義者，詛咒，詛咒這巨大的  
民衆吧，  
在那脚下吻着過去的破片吧，  
用眼淚灑着毀壞了的，破碎了的舊的殿堂吧，  
而自由和勇敢的人是要迎接一個嶄新的美麗  
的世界的。

我們的手臂，我們的筋肉急需巨大的勞動，  
創造的苦惱在我們胸裏燃燒，  
聯合着，我們用我們的蜜使一切的生命變成  
甘美，  
地球也在我們的威嚴的命令下採取一個新的  
軌道。

我們愛着生命，和那令人陶醉的狂暴的歡喜，  
我們是堅強的，甚麼痛苦也不能挫折我們的  
精神。

我們——是一切，我們——在一切中，我們  
——是再生的火焰，  
我們自己，對於我們自己，是上帝，審判者和  
法律。

除了集團主義的要求以外，上面這首譯得非常粗劣的詩還表現了對於工業化的新的要求。就連無產階級詩人所使用的形象都是取自近代的工業——鐵，鋼鐵，黃銅，三和土，工場，蒸氣，號笛，機關，發動機，鐵鎚，等等。再也沒有對於無情的都市的不平，和對於農村的平靜日的憧憬了。勞動者開始把城市和工場放在心上了——這是他的，他的兒子，他的愛，他的可以誇耀的東西。他夢想着更大的都市，巍巍的摩天閣，和浸潤在光和青綠的海裏的“水晶的工場”。看——無產階級詩人嘉斯特夫（Alexei Gastev）在他的我們自鐵中生長（We Grow out of Iron）（譯註：L. 郭沫若譯，“新俄詩選”，光華

版) 中這樣地叫道——

我站在工作檯，鐵鎚，鍋爐，鍛冶器之間，和許多的同志之間。

頭上——是鏈鐵的地方。

兩旁——是豎柱和橫樑。

牠們高舉到七十尺的高度，

牠們拱曲在左方右方。

牠們相會在圓屋頂上，用巨大的兩肩支撐着全部的鋼鐵的建築。

牠們向上推進，牠們很堅牢，牠們很強壯。

牠們要求着更大的力量。

我望着牠們，而漸漸地振奮起來。

新鮮的鐵的血液流入了我的血管。

我長得更加高大了，

我生着了鐵的肩膊和無比地強健的手膀。

我和鋼鐵的建築化而為一了。

我站起來了。

我的兩肩正在衝破屋椽，屋棟，屋頂。

我的腳雖還是站在地上，但我的頭已經超過了全建築。

我因為過度的努力而哽噎，但我已大聲叫出：

“讓我來說，同志們，讓我來說！”

鋼鐵的回聲淹沒了我的話，全部的建築不安地動搖。而我卻昇得更高了，我和煙突一樣高了。

我不要講故事，也不要演說，我祇是要叫出我的鐵的言語：

“我們一定要勝利！”

康閱立斯持，勞動者，皮短褸——努力地活動着，為世界革命，集團主義的社會，工業的樂園的那宇宙的映像所鼓動着——排萬難以向權力前進的，堅忍的，有着決斷力的，有着鐵的意志的勞動

者——這就是在戰時共產主義和勝利的戰爭的最初的浪漫時代的英雄主義和獸性，光榮和悲慘，歡喜和恐怖的那混亂的背景裏最活躍地顯露頭角的典型人物。

## 新俄文學 與 知識階級

---

在三月革命的時代，象徵派的詩人布洛克 (Alexander Blok) 發表了“十二個” (The Twelve) (譯註：胡鄂譯，未名版)，其中包含着如次的生動的字句：

資產階級，這孤零零的送葬者，  
他的鼻子埋在他的襤褸的皮衣裏，  
在街角上茫然若失地站着，  
後面跟着一個諂佞的，污穢的劣狗。

好像飢餓的雜種狗一樣的資產階級，——

一個默默的疑問——站着而又乞食着。  
好像舉目無親的雜種狗一樣的舊世界  
站在那裏，把牠的尾巴夾在兩腿間。

在這首詩中我們看見了展開着的革命。冒着風雪，合着暴風雨的調子，輝耀着紅旗，十二個紅色的兵士從俄國首都的結着冰的街道上和高高地堆積着的雪裏勇猛地前進。在神聖的俄國，在“肥臀”的俄國，在好像“把尾巴夾在兩腿間”的“舉目無親的雜種狗”一樣地站着的舊世界，“塔——塔——塔……”的機關鎗聲響着。酒醉的，放縱的，殘忍的，雄壯的，有力的，踴躍的，革命在向前進。但是資產階級“一個默默的疑問……茫然若失地”站着，一個“把鼻子埋在襤褸的皮衣裏”的“孤零零的送葬者”。他和舊世界，兩個飢餓的，舉目無親的雜種狗……而在旁邊，“穿着黑衣的，身材很大的”憤怒的教師，兩位“哭泣了又哭泣”的“太太”，和“搖

着長髮，帶着悲慟的神氣，喃喃着說：“叛逆者！俄國滅亡了……”的那有教養的，舞弄筆墨的公子哥兒。”

詩人布洛克對於長髮的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輕蔑，他所使用的激烈的詞句，在布留索夫（Briusov）的一首詩中被響應着。布留索夫嘲笑着那些祇在書籍和詩的空想中愛着獨創性，而一當他們昔日的夢想在“煙和騷音”中實現的時候，便帶着嫌惡和恐怖逃避開去的那樣的“幻想家”和“唯美主義者”。一種同樣的態度在大部分的蘇俄文學中表現着——知識分子的懷疑，動搖，決斷力的缺乏是在在被嘲笑和侮蔑的。在自負的，水仙花般的知識階級看來，這樣的待遇似乎是大逆不道的。過去的偉大的俄國文學不是把他們當作“俄國民衆的良心，俄國文化的精華，革命的理想者，詩人，豫言者”而讚美過來的嗎？他們不是也犧牲過嗎？他們不是也痛苦過嗎？難道說僅僅爲了他們

反對那在革命的名義之下行着的粗暴和殘酷的原故，而他們現在就非得被嘲笑和非難不可嗎？

自然，並非所有的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都感覺得和阿克馬托瓦 (Anna Akhmatova) 在她這樣哭訴的時候所感覺的一樣：

一切都賣了，一切都失掉了，一切都被奪去了，  
了，  
死神的翅在我們的眼前閃出黑影……

除了出身於中產階級，但把自己緊緊地和革命的無產階級連結在一起的列甯，特羅茲基 (Trotsky)，盧納察爾斯基 (Lunacharski)，塞瑪西珂 (Semashko)，布哈林 (Bukharin)，和其他的布爾雪維克的指導者而外，還有帶着多少的熱心接受了革命的布洛克，柏里 (Biely)，布留索夫，惠萊沙哀夫以及其他的知識分子。布洛克用基督的出現

祝福牠；布留索夫這樣地勸告知識階級：

愛着這大眾吧，雖然牠是粗鄙的，  
愛着牠吧，雖然牠似乎是野蠻的；  
愛着牠的詛咒，愛着牠的憤怒吧，  
但是最要緊的愛着牠的夢想吧……

柏里歡喜地叫道：

俄羅斯，  
我的俄羅斯，  
是殺着惡蛇的  
上帝的負托者……

馬林霍夫 (Anatoly Marienhov) 因為“昨天”正在

好像一隻鴿子一樣被  
從汽車行裏狂奔出來的  
汽車壓死……

而感動着。愛蓮堡（Ilya Ehrenburg）這樣地叫着：

遠在黑夜之中，遠在世紀，世紀之中，我們散  
播了  
我們的消滅了的生命的花火……

但是，在革命的鹵莽和殘酷的時代中的知識階級的最特徵的態度是被表現在佛洛辛（Maximilian Voloshin）的如次的詩句中：

但是我一個人站在他們的中間，  
在騰騰的煙和火焰中——

雙方都是可愛的，我為雙方祈禱……

這就是在對立已經尖銳化而且不可調和了的革命時代裏最不合宜的，典型的哈孟雷特<sup>①</sup>的態度。

知識分子無論站在哪一方面都是被輕蔑的。因為就是他們中間的那些接受了革命的，從革命者的觀點看來，也還是不能十分令人滿意。並不宣言他們自己是康閔立斯特，他們的大部分都逸出了常軌，沒頭於種種空泛的理論，從神祕主義者，或國家主義者，或斯拉夫主義者，或西歐主義者，或其他種種的立場來迎接革命。和堅強的布爾雪維克對照起來，他們似乎是可憐蟲。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被描寫在蘇俄文學中的他們的姿態。“自然的決定的態度”已為“蒼白色的思想所蒙蔽”的優柔寡斷的哈孟雷特，淺薄的人們，可笑的傢伙，畏怯地把鼻子埋在襤褸的皮衣裏的潦倒的送葬者。

這種主題並不是新的。革命前的文學就充滿

了俄國的哈孟雷特·格里波伊多夫(Griboiedov)的“聰明誤”(Misfortune of Being Clever)中的查茲基;普希金的有名的詩“猶金阿列金”(Eugene Onegin)中的阿列金;萊孟德夫的“當代英雄”(Hero of Our Times)中的培合林;屠格涅夫的小說“羅丁”(Rudin)中的羅丁;同作者的“處女地”(Virgin Soil)(譯註:中譯名“新時代”)中的列茲達洛夫;託爾斯基的南赫留道夫;杜斯退益夫斯基(Dostoevski)的拉斯柯立科夫,伊凡·卡拉瑪左夫和雲多夫;柴霍夫的嘉伊夫;柏里的達里亞斯基;安特列夫(Andreev)的“安拉齊瑪”(Anathema),“吃了耳光的他”(He Who Gets Slapped),等等。無用的,動搖的,理智的哈孟雷特與積極的,單純的,激烈的堂吉訶德的對照,是俄國文學中的一個愛好的主題。在過去,俄國的作家不能不借一個有能力的外國人(歌郭爾的考斯塔希格羅,屠格涅夫的伊沙洛夫,龔察洛夫的斯托茲等)來抵制本國人的懶惰;而現在補充這

積極的原型的，是俄國的康閱立斯特。現代的模型就是：堅決的康閱立斯特的堂吉訶德對動搖的資產階級的哈孟雷特。

消極的，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哈孟雷特和積極的但又實際的康閱立斯特的堂吉訶德之態度的不同，在惠萊沙哀夫的小說“難關”（Deadlock）中，在老革命家伊凡·伊立基·沙塔洛夫教授和他的布爾雪維克的客人列奧立特辯論着的那個場面中，很巧妙地被表現出來了。

向列奧立特時時投以含着敵意的眼光，伊凡·伊立基詢問着：

“哦，哦，你近來怎麼樣？還是那老事情嗎，呃？逮捕嗎？鎗斃嗎？”

列奧立特微笑着。

“遇必要時，無論誰我們都要逮捕，我們都要鎗斃。”

“有很多這樣的必要嗎？”

“是的，很多。反革命在陰謀着，潛伏着，而且隨時可以乘機而起。”

“很多，很多嗎？是的，凡屬不是布爾雪維克的人。那就是說全俄國的人民。你倒有不少的工作在你面前呢。”

“我們並不損害勞動着的人民；我們要竭力使得他們信服，因為我們知道遲早他們一定會到我們這邊來的。但是我們對於資產階級是一點也不客氣的。他們是無論怎樣也不會和我們連結在一起的；一切的議論都是廢話；我們最好索性把他們消滅。”

“消滅？這話我倒有點不懂。你大概不是講肉體的消滅吧？”

“是的，甚至肉體的。假如我們不把他們掃除的話，他們是一定會跟旦立金和珂爾察克結合，而來和我們對抗的。”

卡蒂亞，這教授的孟爾雪維克的女兒，被驚駭

了。

“你這是說的甚麼話，列奧立特？馬克思主義祇是說改變那使資產階級的存在成爲可能的社會條件，而並不是說把資產階級肉體地消滅啦。天呵，多麼可怕呀！”

列奧立特大不謂然地望着她。

“哦——哦，我的親愛的，革命不是用清潔的纖細的手所能夠做得成功的呀。最要緊的，馬克思主義是辯證法的；牠是適應每個歷史的瞬間而發展牠自身的行動的樣式。”

列奧立特不能把伊立基和卡蒂亞說服。他們祇記得，當克倫斯基重新採用死刑的時候，布爾雪維克是怎樣激烈反對過來的。

“奇怪，”列奧立特聳聳他的肩，“我們似乎是說着兩種不同的言語。那時，你難道不知道，問題是要把那堂堂地反對參加犯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的兵士處以死刑；而現在問題是要殺掉那在暗

地裏危害着革命的奸細。”

咬着他的嘴唇，伊凡·伊立基叫道：

“背叛了革命，無望地而且無可挽回地背叛了革命的，就是你們，你們呀！”

不管他們的仁慈的言語，他們的犧牲的精神，以及他們對於“民衆”的那被承認的和真摯的愛，伊凡·伊立基和卡蒂亞終於接受了拉格爾和他的黨徒。他們的懷疑成爲了消極的反革命。他們是優美的，可愛的，慷慨的人物。困難就是在於他們看見革命不是在文雅的樣式下遂行而感到愠怒。

康閱立斯特的女郎維娜，這仁慈的伊凡·伊立基的不認了的女兒，卻更與時代的精神相一致。在她的死之前夜，她誇耀地說：“現在是不應該爲自己的靈魂的純潔，和牠的平靜而苦惱着的時代了……用和平，親切，和愛，是甚麼事情也做不成功的……剝奪？死亡？哦，那算得了甚麼一回事……”

但是像伊凡·伊立基那樣的人是不能夠贊同

這樣的可怕的思想的。醜惡是醜惡，殘酷是殘酷，沒有甚麼東西能夠使醜惡和殘酷成爲正當。這似乎也是塞孚琳娜 (Seifullina) 的小說“旅人” (Travellers) 中的主人公李托佛茲夫的態度。李托佛茲夫是一個典型的舊式的人民派——陶醉於美的抽象和誇大的言語的知識分子。他反對充滿了血和悲慘的十月革命。“但是聽，我的親愛的人，”康閱立斯特的司迪彭勸告着，“你的燦爛的原理把你從活的現實隔開了！但是我們——我們是生活在這現實裏，而且是不爲醜惡和叛變的呼聲所驚駭的。”另一個康閱立斯特補充着說：“聽，你這人民派的知識分子，你們做了很久的民衆的電話交換手。你們把驚人的觀念，神聖的思想傳送於他們。但是你們難道不知道現在電線已經切斷了，再也沒有甚麼方法可以用電話來傳達民衆嗎？我們應該去，我們應該深入到他們的中間去……困難就是在於你不聽他們的活的聲音……”

同樣地，當理想主義的尼濟塔·菲丁（Fedin）的小說“兄弟”（Brothers）中的主人公，對他的康閱立斯特的兄弟羅司迪斯拉夫擔保着說他（尼濟塔）祇“傍觀和靜聽”就夠了，而且說他既不願反對父親，也不願反對兒子，也不願反對兄弟的時候，羅司迪斯拉夫回答說：“但是父親，尼濟塔，父親要反對我們呀；這就是困難之處啦！……至於你現在——我十分地知道你。假如你站在我們這一邊，你就必得反對父親；假如你和父親聯合，你就必得反對我們，你的兄弟，就在這裏的我！假如你兩方都不願加入，那你就會永遠在空中擺動，而且會連喝一口水的地方都找不到呢。”正如理想主義的教授沙塔洛夫祝賀着拉格爾的義勇軍的前進一樣，前社會主義革命家李托佛茲夫和理想主義的作曲家尼濟塔也抱着以爲哥薩克軍一定會使俄國恢復秩序和自由的那樣的幼稚的信仰歡迎着白軍的到來。

那些加入了白軍的舊知識分子的命運雖是很悲慘的，但是還遠不及那些留在布維雪維克的統治下的舊知識分子的命運悲慘。前者（加入了白軍的知識分子），和敗了的軍隊一道，倉皇地節節退卻，一直到他們設法逃到了歐美各國，在那裏，等待着，祈禱着和策畫着布爾雪維克的顛覆，他們度過了一種無家可歸的流浪者的悽慘的生活。雖然這樣，他們究竟還有人同情，理解，而且還常常受人尊敬。至於那些殘留在蘇聯境內的卻更倒霉了；他們不僅被革命弄得經濟破產了，而且被內戰和飢餓弄得身體也衰弱了，而，最壞的，他們同時被不斷的迫害和一般的侮辱和疑惑弄得精神上完全破碎支離了。要想稍微知道一點舊知識階級的生活中的這種姿態，和這個俄國文化的精華的完全的墮落和凋零，我們必須讀一讀萊奧洛夫（Leonid Leonov）的那篇題名“小人物的末路”（The End of a Small Person）的陰鬱的小說吧。

在這裏，我們看見化石學教授立哈列夫，詩人克羅姆林，醫生約爾金，前船長和軍人迪塔斯，等——通通變成了一羣在下層深處的潮濕的空氣裏輾轉着的灰色的，多產的，飢餓的蛆蟲。他們都失掉了他們的人間的容貌，他們的生活的目的，以及他們所曾經那麼喋喋不休地談論過的那“永遠的價值”的執着。被貧困和飢餓所壓倒，被除根，被輕視，他們開始露出他們的卑劣的自我來了——一點優良的教養或是公正的態度的痕跡也沒有了的，卑卑不足道的，嫉妬的，可憎惡的人物；他們說謊，他們偷竊，他們欺騙，他們扯着彼此的頰鬚，當他們聚在一起的時候，那簡直活像一個穢惡的，令人難受的瘋癲醫院。“好笑，好笑”立哈列夫喃喃地說，當他望着這羣奇形怪態的零落者的時候。“十年前，偶然地……一個甚麼人潑了一桶污水在我的身上……那恰和這個一樣地穢臭和令人作嘔。”“污水？”約爾金悲劇地緊握着他的手，“你講污水

嗎？一個花壇——一個可愛的小花園！稀有的芳香的集合。今後五十年，當新的到來時，我的這些標本恐怕已經消失，已經完全絕跡了……人們會出錢到博物館裏去看這些小小的骨頭呢！”

其實，他們已經是古物了：寫着關於“俄國之死”的無意義的詩句的肺病詩人克羅姆林，把他所遇見的各種奇怪的標本加以分類和號碼的怪醫生約爾金，斷言他所認識的人個個都是猴子尾巴的祕密所有者的紳士，儲蓄着錢但是讓自己的兄弟餓死的投機商人，以至於曾經做過化石學教授，現在有了五十二歲，自己也就變成了化石的，爲這小說的中心人物和這一羣人中的最優秀者的立哈列夫自己。像這樣的一個知識的和道德的侏儒而竟曾經當過甚麼教授，這真不免有點令人喫驚了。現在他的華美的羽毛被剝去了，我們纔曉得他祇是一個鈍感的，頑固的，利己的，缺乏想像力的蠢魚。他一點也不感到負了義務地，悠然地從別人手

裏接受了犧牲，有時從那頑愚而弱小的文化狂的猶太人墨霍洛維基，有時從他自己的那極其溫柔而又富於獻身精神的妹妹，他們兩人都是祇要“文化”的火把在“偉大的”立哈列夫的手裏不失去光輝，是甚麼都願意犧牲的。但是立哈列夫，至多能苟延殘喘，現在在精神上是已經死去了；他除了口頭談談他自己也知道他是決不會寫出來的那著作以外，是再也不能夠做甚麼了。他可憐地一點辦法也沒有，而且甚麼都不能夠適應了。

作者把立哈列夫寫做一個古物學者，一個化石研究者，是含有象徵的意味的。立哈列夫，這知識分子，完全沒有同活的現實接觸。革命猖獗也好，民衆死亡，呻吟，和痛苦也好，立哈列夫教授卻祇站在太古的岩石之前陶醉於默默的讚美中。對於他所生活在的這劃期的時代一點感覺也沒有，對於別人的痛苦令人難於相信地漠不關心，立哈列夫教授是直到革命影響了他個人的生活和幸福：

的時候纔曉得有革命這回事的。

參加着革命，在勝利的軍隊裏戰鬥着，像無產階級的或是農民的兵士一樣地流着血的那知識階級中的年青的分子，也不蒙蘇俄的作家予以更寬大的待遇。他缺乏着可以在他的同志間引起無條件的信賴的那種冷靜，團結力和確信。他是一般地被描寫成柔弱的，不堅定的，動搖的。這個我們可以在菲丁的有名的小說“都市與年月”（Cities and Years）的中心人物安特列·斯達茲夫（“斯達茲夫”這個名字是含有意義的：牠暗示着衰弱，舊的時代）中看出。斯達茲夫，雖是一個布爾雪維克，是革命中的一個多餘的人物。爲了救一個反革命的貴族的性命，他不惜妨礙他的革命的義務的遂行。他躊躇着，他演着兩重腳色，而結果是完全的心理的分裂和自殺。

同樣地，法兌耶夫（Fadeev）的“十九個”（Nineteen）（譯註：魯迅譯，“毀滅”，三間版）中的一個主要的人

物，學生美諦克，也是為典型的知識階級的種種的煩惱所苦。恰如安特列·斯達茲夫是康因立斯特的顧爾特的直接的對立物一樣，美諦克是頑強的，粗野的，堅決的，巴爾底山的鬥士——莫洛茲加，多波夫，巴克拉羅夫的直接的對立物。美諦克是一個柔弱的，不堅定的無用的知識分子，一個渺小的而又多餘的人物。神經過敏的，分析的，病態地敏感的，自尊的，軟弱的，他甚至連把他所想望的，而且會三番四復地獻身於他的那女人據為已有的勇氣都沒有。他不能夠在這些人們中間做朋友。雖然他自願地加入了別動隊，而且在戰場上負過重傷，他依然是這生疏的世界中的一個完全的外來者。直到小說的末尾，當全別動隊的命運都懸在他的堅忍和忠誠上面的時候，他變成了一個卑怯者。美諦克的態度，在他覺察了他自己所做的事的時候，是非常有趣的。他陷入可怕的絕望中，他瘋狂地扯着他的頭髮：“哦——哦——我做了甚麼事，我怎麼

會做了那樣的事，我原是那麽善良，那麽忠實，我是從沒有起過意思要害甚麼人的，我怎麼會做了那樣的事呀！”他的可惡的行爲愈見顯明，他就愈覺得以前的他是更善良，更純潔，更高尚。他所苦惱的，“不是因爲覺察到把生命寄託於他的那許多的人通通送了命，而是因爲想到留在他的良心上的這個不可磨滅的污點是與他所想像的他的一切善良和純潔相矛盾的。”被迷惑和驚駭，他凝視着他的手鎗，但是他立刻自覺到“他決不會而且也決不能夠自殺，因爲在這世界上的一切的東西中他所最愛的就是他自己——他的白皙的，弄髒了的，纖弱的手，他的唉聲歎氣的聲音，他的苦惱，他的行爲，甚至最可厭惡的行爲。”但是，漸次地，美諦克安於他自己的命運了。他再也不呻吟和哭泣了。過去對於他好像一場可怕的惡夢一樣。“我再也不願忍耐下去了，”清醒的思想格外明顯地在他的腦中閃過；他開始憐憫起自己來。“我再也不能夠忍

受了，我不能夠忍耐這種卑賤的，非人道的，可怕的生活了……我要回到城裏去，我現在再也沒有旁的甚麼辦法了。”這麼想着，美諦克極力想使得這事情在他看來實在是出於萬不得已，但是在他的心的深處，他雖覺得可羞，而且害怕他也許終於不能逃到城裏去，但他還是不能抑下一種祕密的歡喜的感情……“可是假如白軍攔住了路呢？……哦，那有甚麼關係？……”於是，在卑怯者之上，學生美諦克更進而變成了一個背叛者。

與從知識階級的觀點來描寫知識階級和大眾的衝突的許多西歐的和美國的戰爭小說強烈地對照着，蘇俄的小說大都是站在勞動者和農民的觀點。但是法兌耶夫是一個極其謹嚴的藝術家，他不能不對於這位學生的過失提出一個辯護的理由。爲了要對於美諦克的描寫力求忠實，爲了要對於從理想主義的青年到卑怯者和背叛者的那一見似乎難於相信的變化加以說明，他指示着過失並不

完全是在知識分子。從他在這些人們中間的最初的出現起，美諦克便被猜疑，迫害，嘲笑。他的文雅，他的白皙的手，他的攜帶他的愛人的照片，他的不能照顧他的馬，他的含羞和他的無能激怒了這些粗暴的人們；這個在他的心中引起了許多心理的反感，那反感終於變成了卑怯和背叛。柔弱，文雅，敏感是知識階級的生活的癥結；使他在困苦艱難的時代中變得完全無用的，就是這個癥結。

巴別爾 (Isaac Babel) 在他的短篇傑作“多爾古索夫之死” (The Death of Dolgushev) (譯註：杜衡譯，載“新文藝”二卷一號) 中是多麼令人難忘地描寫了這個。故事是由在波蘭戰線上的有名的布丁尼騎兵隊裏的一個有教養的戴眼鏡的人，一個典型的不決斷的知識分子的口中說出來的：

坐在路旁的人是多爾古索夫，電話管理人。他的腿伸張着，他固定地對我們呆看。

“喂，”多爾古索夫說，當我們走近他面前的時候，“我快要死了。懂得嗎？”

“我懂得，”格利斯卻克回答，停了他的馬。

“你必須花錢一顆子彈在我身上，”多爾古索夫嚴重地說。

他坐着，靠在一株樹上。他的靴子遙遙相對地分開着。沒有把他的眼睛離開我，他小心地翻開他的襯衫。他的腹部已經裂開了，他的內臟垂到了他的膝上；他的心跳可以看得見。

“波蘭兵來了，會拿我來開玩笑。這兒是我的身分證……請你寫信把這情形告訴我的母親……”

“不，”我哽噎地囁嚅着，用馬刺來刺着我的馬。

多爾古索夫把他的青白的手掌伸在地上，不相信一般地審視着牠們。

“你要跑開了嗎？”他喃喃地說，他的身體下垂着，“那末跑吧，你這畜生……”

汗流遍了我的身體。機關鎗帶着有加無已的速度，帶着歇私底里亞的執拗，不停地響着。包在落日的餘暉裏，阿封卡·比達向我們跑來。

“我們稍稍勝了一點，”他歡樂地喊。“這邊怎麼樣？”

我指了一下多爾古索夫，便跑開了。

他們的談話是很簡短的。我聽不見他們的話。多爾古索夫將他的證書交給了那個伍長。阿封卡把牠插在他的靴統裏面，然後對準多爾古索夫的嘴巴開了一鎗。

“阿封卡，”我可憐地微笑着說，趕着那哥薩克人，“你知道，我可辦不了……”

“走開，”他說，臉色蒼白了，“我要殺死你！你們這些戴眼鏡的傢伙，你們憐憫我們的兄弟，好像貓哭耗子一樣……”

他扳起引發機。我默默地跑了開去，不敢回轉頭來，祇覺得冷氣和死透過了 my 背。

“別這樣，”格利斯卻克叫，他抓住了阿封卡的手。“別這樣胡鬧吧。”

“沒用的傢伙，”阿封卡叫道，“我總要捉到他的。”

這個場景在某種意味上是象徵的。

“不，”不能犧牲他的靈魂的“純潔”的那矯飾的知識分子說。“畜生，”“沒用的傢伙，”憤怒的大眾回罵着。革命就是這樣地把那曾經光輝絢爛於一時的哈孟雷特從玉座上拉了下來。反之，他們現在祇是“畜生”，“沒用的傢伙”，膽小的東西，飢餓的雜種狗，捲入在偉大的革命的漩渦中的無用的浮荷和棄物……

## 新俄文學 與 農 民

---

農民主人公在俄國的詩歌和小說中並不是新奇的。從太古的時代以來，俄國人就是農業的國民。他們的最初的民謠和敘事詩，俚諺和故事便反映了農民的生活和希望，夢想和失敗。俄國的byliny (敘事詩) 中的最偉大的而且最可愛的英雄是伊利亞·莫羅美茲 (Ilia Mourometz) —— 一個農民。密古拉·綏立亞利羅維基 (Mikula Selianovich)，在俄國的民謠中被歌頌着的另一個偉大的 bogatyr (俄國傳說中的英雄)，是農民的意識形態的有光輝的具象化。最受人祈禱和讚美的，在農村中最孚衆望的聖者，就是那些對於農民的命運

極爲關心，齋來日光和賜與驟雨，保護家畜和種植穀物的人們。在較近的民謠中的兩個最得民心的人物，是司鐵卡·雷森（Stenka Razin）和耶美立亞·蒲嘉契夫（Yemelian Pugachev），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領導廣汎的農民暴動的兩個有名的哥薩克農民。

但是農民在正式的文學中出現，卻是比較較近的事。在十八世紀的古典主義者或是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者的作品中我們看不見農民。浪漫主義者雖有時也向農民的軼事中去尋找傳說的主題（普希金，歌郭爾，在他們的浪漫的氣分中），但這究竟是很稀少的。直到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A Sportsman` Sketches）出現的時候，農民的型纔輸入了俄國的文學。繼屠格涅夫之後的，則有阿克薩珂夫（Aksakov），託爾斯泰，格里郭羅維基，列克拉斯夫（Nekrasov），烏斯倍斯基，及其他，他們都是近於把農民感傷化，理想化，而且幾乎神聖化。

輕視西歐的影響；而且，像農業貴族一樣地，懼怕進化的都市文明的那些斯拉夫主義者和反動家，把農村當做俄國的一切健全的，虔敬的，堅實的東西的寶庫，把農民當作古代斯拉夫民族的最純潔的理想之高貴的負擔者，而讚美着。把農奴制當作俄國的產業發達的障害物而非難着的那些西歐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也讚美農民，而且對於他的痛苦灑着同情之淚，竭力使全世界相信可憐的農民是應該有更幸福一點的命運的。

農奴制的廢止促進了俄國社會的下層之階級的分化，而其結果是造成了當作俄國生活中的進步的要素的無產階級的擡頭。農民失去了王位。新的作家，大半是從都市的中流的和下層的階級出身的，如柴霍夫和高爾基，開始反覆申說農村的全然的遲鈍，無知，和野蠻，以及農民的非常的愚魯，卑屈，和下賤。變化了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條件結晶於變化了的文學的模型中了。

世界大戰，革命，共產主義，國內戰爭，新經濟政策在俄國的農村中齎來了經濟的和社會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深刻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又齎來了生活中的新的農民的英雄和小說中的新的農民的模型。

像一切革命一樣，俄國的革命也是辯證法的，有肯定同時也有否定，有創造同時也有破壞，有光榮同時也有痛苦。在初期的階段，力點是無可和解地置在破壞上。舊經濟形式，社會的傳統，被尊崇的習俗，神聖不可侵犯的關係，宗教的偏見，個人的習慣——一切都在破裂，瓦解，崩潰。感情被解放了。舊的和新的在決着死戰。舊的抵抗着，頑強地，拚命地，兇暴地抵抗着——不管是由有高的教養的資產階級或是由近於原始的農民所代表。

實際上，最強硬和頑固的是農民。知識階級，這有教養的，西歐化了的，但在俄國生活中並不根深蒂固的，無關輕重的少數人，是不成甚麼很重大

的問題的。一朵美麗的花，孤立而又柔弱，牠是很容易在勞動者和農民的那釘着平頭釘的靴子之下被壓碎的。但是農村卻不然——懶惰，無知，頑固；有時非常動人地仁慈；當被激動了的時候，就原始般地殘忍——農村，農民便代表了俄國全體。陷於貧窮，為苛稅所苦，他的兒子和兄弟都被殺死在戰場上，農民所唯一渴望的就是土地與和平。他的熱望是單純的，牠的表示則更為單純。他把刺刀插在地上，連忙跑到他的村裏，去殺死或是驅逐地主，焚燒房屋，奪取土地。這個完成了之後，他便願意重復浸入他多年的癡痺狀態中去。因為農民對於政治是不感興趣的，所以，他祇要不被攪擾，至於現在沙皇已經被推翻了，誰握政權，都市上的人們想要怎樣幹，這些，他是不大關心的。從戰線上的大批的逃脫和對於地主的土地和家畜的整個的沒收，是在布爾雪維克獲得政權之前好幾個月就開始了的。臨時政府雖極力想用箒柄來挽回大勢，

但終於徒勞無功。當布爾雪維克奪了政權的時候，他們對於這已在進行的過程加以贊許。

但是用他自己的狡猾的看法，農民開始在兩個實際上是同一意義的東西——布爾雪維克和康閱立斯特——之間分出界限。布爾雪維克在他看來是那些擁護和平與土地的沒收的；康閱立斯特是那些使用新造語，攻擊正教會，聖者，婚禮的儀式，主張男女平權，稱呼最貧窮的農民為社會中的健全分子的。在農村中，沒有甚麼康閱立斯特，除了一二個受過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態度和言語的影響的，從大戰歸來的散兵，或是偶然一個因為失了業而不得已回到農村來的工場勞動者而外。這些都會化了的個人就是富農所最痛恨的革命的酵素。同類的農村的住民開始表現出在經濟上和意識形態上的顯明的分化；這些產生了感情的激發和肉體的鬥爭。

事勢的必然的歸結使農村再也不能夠沉於不

動的狀態中了。城市需要着麵包；農民是極不願意把他的穀物讓與別人的，除非他獲得了直接的而又實在的報酬，或是具有實在的購買力的金錢，或是被需要的工業生產品。但是城市，在革命和內戰的慘痛中，是甚麼東西也拿不出來的。工業，在革命以前就差不多陷入癱瘓狀態了，在現在是完全停頓。城裏派來的徵發隊遇着了極頑強的反抗。除了甚麼也拿不出來，因此甚麼也不怕的那些最貧窮的以外，農民們都躲避着他們對於國家的義務。自由在他們看來就是沒有責任，沒有租稅，沒有義務。不僅如此，在南部地方，哥薩克人，這舊時代的走狗，恐怕失掉沙皇所賜與於他們的種種的特權，竟起而武裝反抗無產階級的獨裁。反對黨開始吸收着這些分子。珂爾察克軍，且立金軍，拉格爾軍，捷克斯拉夫軍，波蘭軍，聯軍和德國軍成爲了反革命的重心。農村中的憤憤不平的分子歡迎着以舊的忠義——宗教和國家主義相號召的那些沙皇時

代的將軍們的到來。“殺死猶太人和共產主義者來救祖國吧！”就是一個最有勢力的口號。殺戮，掠奪，和放火的魔鬼在國內橫行——在遼遠的西伯利亞，在乾燥的土耳其斯坦，在高加索的山脈地方，在烏克蘭的無際的平原，在阿堪遮的極北的寒氣中。

不久農民便發見白黨的將軍，士官，和貴族軍並非自己的朋友。他們一到甚麼地方，那地方便充滿着騷鬧，淫亂，和殘酷的報復。跟着，以前的地主，沙皇時代的官僚，和外國人龐然地而且不祥地出現着。許多的農民起了一種強烈的反感。在全俄國，個個村落，區域，全地方編成了巴爾底山部隊（遊擊隊），退入森林和草原，指揮對於敵人的原始的反抗運動。“伊凡，和安東，和塞爾吉；瑪麗亞，和伊立札維達，和卡特琳娜都被逼迫地離開了耕作，離開了耕作的生活，他們的腦子裏充滿了由馬克斯（Marx）和賈克倫敦（Jack London）結合而成的

可怕的混合物；他們差不多通通投身到紅軍裏面去攻打白軍，祇有那些最強的纔生存了下去，”皮涅克這樣地寫着。

皮涅克所講的那些伊凡和瑪麗亞就是農民劇中的新的主人公。“新賈克倫敦男女，”皮涅克這樣地稱呼他們——他們是蒼白的，有力的，敵愾的，誇勝的。這個時期中的文學便充滿了這些近代的密古拉·綏立亞利羅維基和伊立亞·莫羅美茲，新的司鐵卡·雷森，和耶美立亞·蒲嘉契夫的英雄主義。

回想一下巴別爾的對準着自己的受了傷的同志的嘴巴開了一鎗的那非常特出的阿封卡·比達吧。一個多麼的巨大之姿呵！或者再看一看巴別爾的小說“信”（The Letter）（譯註：徐調孚譯，載“文學週報蘇俄文學專號”）中的柯迪考夫吧。甚麼樣的朴素的殘酷，甚麼樣的巨大的英雄主義，甚麼樣的奇怪的康閣立茲姆！年青的柯迪考夫一面婉轉地懇求他的

母親去洗洗他的馬的爛了的腿，一面照實地告訴她，說他的父親，一個白黨，殺死了他們三兄弟中的一個，而沈嘉，殘存着的兩兄弟中的一個，一個布爾雪維克，把父親殺死了。他這樣地寫着：

但是沈嘉一抓住爸爸，他就開始鞭打爸爸，而且令所有的兵士都整隊地立在圍場上。於是沈嘉把水潑在爸爸迪莫菲·羅丁立契的鬍鬚上，染色從鬍鬚上脫落了，沈嘉問迪莫菲·羅丁立契：

“你覺得舒服嗎，爸爸，在我的手裏？”

“不，”爸爸說，“我覺得難過。”

於是沈嘉又問：

“那末菲兌耶在你的手裏被你宰割的時候，他覺得舒服嗎？”

“不，”爸爸說，“菲兌耶覺得難過。”

於是沈嘉又問：

“你可曾想到，爸爸，你也會覺得難過嗎？”

“不，”爸爸說，“我沒有想到我也會覺得難過的。”

於是沈嘉轉向羣衆，說：

“我想我萬一落在你手裏的時候，你一定不會憐惜我的。現在，爸爸，我們要結果你了。”

迪莫菲·羅丁立契開始咒罵沈嘉和他的母親和聖母，並且打着沈嘉的嘴巴。沈嘉把我從圍場上遣開，所以我不能夠，我的親愛的母親，葉夫杜吉·菲多洛夫娜，把他們怎樣結果爸爸的情形描寫給你看，因為我是被遣開了。

這就是農民——直率的，原始的，殘忍的。戴眼鏡的知識分子是會氣結喉塞，嗚咽啜泣，而終於無可奈何地一蹶不振的。農民便不如此：他是一塊東西削成的——一塊不可動搖的獨石，自然力的，巨大的，屹然不動的，堅固的。這就是蘇俄文學中的巴爾底山的英雄——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

(Iron Stream) (譯註:曹靖華譯,三間版) 中的郭見鶴,富爾瑪諾夫 (Furmanov) 的史詩“却拍葉夫” (Chapaiev) 中的却拍葉夫,法兌耶夫的“十九個”中的莫洛茲加,萊奧洛夫的“獾”(Badgers) 中的巴維爾和謝明,伊凡諾夫 (Ivanov) 的小說和短篇故事中的許多巴爾底山的英雄,等等。這些農民並不是真正的康閔立斯特。他們不很知道列甯,而且把卡爾馬克思的名字都弄錯了。他們對於康閔立茲姆的觀念是非常幼稚的,而且常常是荒謬的。但是,生成的指導者,本能的組織者,這些近代的司鐵卡·雷森和蒲嘉契夫們,對於布爾雪維克的最後的勝利是有很大的貢獻的。

雖不及遊擊戰的敘事詩的英雄那麼顯耀,但從最近的發展看來,卻有無限重大的意義的,是在農村中的可怕的文化上和經濟的鬥爭中的登場人物。

“從一九一七年以來,” 塞孚琳娜充滿了歡喜

地說，“都市使農村捲入漩渦了。一切都是新的，新的，新的。聽不慣的言語，好像釘子一樣，刺入習慣了單調和平凡的那柔軟的腦袋裏去了。生活樣式，因為牠的新奇而使人害怕，在不斷的命令中急轉直下。一切衰老的，都注定了破滅的命運。固然，過去的生活是殘酷的，奴隸的，但牠究竟是有規則的，整然的，為多少年代的經驗所確定了的。就是當生活的平靜的過程偶然被戰鬥和流血，被酒醉的放火和死亡擾亂了的時候，這些擾亂也是很平常的，可理解的……節日的酒宴上的喧嘩，雖是很野蠻和殘酷，成爲了習慣而且並不覺得可怕了。河流不是有時似乎僅僅爲了要再一次沉於夢遊的極樂的境界的原故，而汎濫於兩岸，威脅，破壞嗎？現在可不是那樣：最可怕的要素——人間的血——已經被激動了。牠怎樣而且甚麼時候纔得夠平靜下去呢？”

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一九年的革命的初期時代

中的“混亂的”農村和各種農民的典型的一副最忠實的圖畫，被展開在塞孚琳娜的優秀的小說“肥料”(Humus) (譯註：隋洛文譯，連載“北斗”一二期)中。在這裏，中心人物是農民蘇甫龍，世界大戰中的一個老兵士。在革命以前，“他實際上完全沒有土地。他所僅有的一點土地是由他的女人和他的年紀大點的孩子們耕種着，而且毫不足觀。他是一個酒徒，在村中的園圃裏遊蕩着，或在籬笆的傍邊酣睡着。他從沒有務過農事。在村裏他始終是一個外來的人。”和他並排，還有許多其他的村裏的貧人的代表者。有偷馬賊沙夫洛斯加，“他的頭扭在一邊了，他的頸部受了傷，當全村的人因為他偷了馬的原故而把他打得半死的時候。”還有列特金，他的“內部已經腐爛”，而他還在徒勞地想“改良他的生活狀態”。“我家裏有九個飢餓的口，”列特金叫着，當他要求把所有的土地都歸公社接收的時候，“我的孩子們，雖然很小，是願意用他們的牙齒來耕種土

地的。但是土地在甚麼地方呢？我甚麼地方有土地呢？甚麼地方呢？甚麼地方呢？我的兄弟在大戰中被殺死了——他的家庭有土地嗎？”沙夫洛斯加也同樣地爲了他的痛苦而復讎。“他恰當地報復着呀！有一天，他昂頭闊步地走到教堂裏去，向那裏的所有的人們詬罵着，露出他的身體的最猥褻的部分，用人家連想都不敢再想的言語嘲罵着上帝。”

除了蘇甫龍，沙夫洛斯加，和列特金以外，塞孚琳娜還描寫了許多其他的人——沒有土地的農民，農場上的作工者，放浪者，和其他同樣的農村中的典型人物。雖然這些激昂的野蠻人是很醜惡和可厭的，但是作者極力表示着就是在他們的殘忍和暴行裏面也有一種深刻的，不可抵抗的真理。這些無賴漢和流浪者，這些遊民和惡徒都是爲他們的生活的完全的絕望所逼迫而不得不流於飲酒，偷竊，和褻瀆的。一個人的內部“既已腐爛”，就

是勤勉，就是極力想“改良自己的<sup>1</sup>生活狀態”，又有甚麼用處呢？毋怪乎他們現在是布爾雪維茲姆的那麼熱心的信奉者！毋怪乎在農村的集會上他們是那麼大聲疾呼地嚷求着土地！

富農們反對。莊重的，尊嚴的，有着可敬的，梳理得很講究的鬚髯，長的外套，和厚的皮靴，他們傲慢地眺望着這羣襤褸和赤腳的人們。他們最先是依仗基督的精神和聖書，但是被罵倒了。羣衆威脅地凝視着，於是珂柴林，最富的農民，便借助於狡猾和外交政策：

“至於布爾雪維克的教義，”他說，“我們是一點也不反對的。我們也反對戰爭；如聖經上面所說：‘你不要殺人。’遵照聖書上面的話，我們也覺得我們應該扶助貧人。但是，朋友們，人的教義；究竟不是上帝的教義；牠是常常帶着我們的罪障的。奪取，霸佔是不對的，有害的。而且，請問你們，

奪取我們的土地究竟是甚麼意思呢？我們並不是白得了牠的。這一切都得和平地，鎮靜地，而且友誼地來討論。我對於布爾雪維克的教義也頗感到了興味，我甚至爲了這個目的到城裏去過一趟。我纔知道了他們的大師是卡羅·馬克索夫（譯註：他是講卡爾馬克思，但把音發成俄文式了）。哦，哦，他並不是一個俄國人，你知道，他是用外國語寫下他的教義的。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去確實地探出關於馬克索夫的著作的真相。俄國人是輕易聽信別人的話的。別人講甚麼，我們就相信甚麼。我們簡直不慣於辨別。講到教育和外國語，我們是完全不行的。即使我們獲得了真正的外國的原本，我們能夠說出列寧加了一些甚麼在那上面嗎？我們應該首先學習外國語，然後把俄文的著作和外國的原本對照一番。然後再來談“萬國的無產者”，時間還多着呢。像政治這樣的東西，我們非得澈底了解不可。要了解這些東西，我們非得有時間，可靠的人，並且——和平，

鎮靜不可；不要那樣，陷於新的束縛之下……”

自然，這種油滑的話是祇能引起憤怒的效果的。富農們從集會所裏被推擠了出去。蘇甫龍着手把全部的貧農都登記到共產黨裏去。辦法是很滑稽的。蘇甫龍對於黨的原則和黨的組織是一點也不知道的；他挨家按戶去登記——夫，妻，兒女——甚至嬰孩。“喂，村裏的貧人們，來吧！那些不署名的，沒有土地呀！”村裏的自由主義者抗議着：“但是，公民們，這是不對的；加入政黨並不是這樣的辦法呵！”因為這樣的迂遠而不識事務，這位知識分子被一脚踢開去了。“畜生！愚蠢的暴民！”他不平地喃喃着說。這個愉快的插曲完了之後，登記暢快地進行着，伴以粗鄙的戲謔和喧鬧的惡戲。蘇甫龍非常得意，當他後來把名簿交給城裏的委員的時候——一百八十五名布爾雪維克！委員差不多歡喜得跳將起來了——多麼大的成功呵！

漸次地，蘇甫龍，這以前的村裏的酒徒，展開了他的活動性。他召集會議；他使人們甚至富農們唱着國際歌；他組織革命的衛隊；他指揮農村公社的形成和地主的農作物和農具的徵發；他爲了全村的利益而沒收一個豐富的私人圖書館——總之，借皮涅克的話講起來，他是在“努力地活動着。”

對於農民的性格的一個奇妙的而又無疑地典型的側面觀，是塞孚琳娜對於蘇甫龍與村裏的教師和村裏的醫生的關係的描寫。這粗魯的農民（蘇甫龍）被村裏的年青女教師的清潔，端莊，優雅欺騙了。她同他講書，她不鄙視他的同伴；她懇勸而又親切，但始終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蘇甫龍受寵若驚，而終於和她戀愛起來。但是當他發覺這位高尚的太太竟和城裏的教師幽會的時候，他憤怒了。原來一切都是假冒！原來她並不如她所假裝地那麼純潔！原來她是資產階級！他的理想破碎了，蘇甫

龍憤怒得差不多發狂了；他襲擊這女教師，加她以種種的凌辱，然後把她強姦。關於醫生的事情，蘇甫龍的行爲則更爲怯懦。新來的醫生在他自己的屋頂上安置了一個避雷針。蘇甫龍，不知道避雷針的用途，疑心這醫生和反革命的哥薩克有祕密的連絡，於是把他殺了。塞孚琳娜自然不惜使用強烈的色調，當她描畫農村的布爾雪維克的時候。而且，插入種種關於自由主義者，教師，和醫生的插話，她使讀者覺察，被喚醒了的農民對待知識分子是用怎樣令人難於相信的疑惑和殘忍。

蘇甫龍的結局是很悲慘的。當哥薩克侵入村裏來的時候，他和他的輔助者爲了他們的布爾雪維克的罪惡是獲了酷報的。富農們，他們的土地和農具已經一部分被充公了，張開着兩手歡迎哥薩克。布爾雪維克的首領們遭了逮捕，被用粗的繩子縛了起來。富農們（Kulaks）開始報復。“哦，蘇甫龍·阿達莫羅維奇，”富農契嘉洛夫嘲弄着說，“你

的公社怎麼樣？你所奪了的農具怎麼樣？”他吐了一口唾沫在蘇甫龍的臉上，用他的堅硬的拳頭恰恰打在蘇甫龍的眼睛上。蘇甫龍號叫起來，使得全地方都響徹了他的叫聲。契嘉洛夫把他掀倒在地上，用那沉重的長靴在他的肚皮上面踏踐着：“這就是爲了我的耕地！這就是爲了我的家！這就是爲了我的財產！這就是你的報酬呵！”蘇甫龍暈了過去。他們把冷水灑在他的身上，於是又毆打着他。蘇甫龍被殺死了，他的妻的下腹部被剖開了，她的胎內的嬰兒被拋給豬吃了。其他的指導者們也遭了同樣的處罰。在巨大的變動中的最初的先驅者，他們被屠殺，他們的身體被分裂，他們的遺骸被拋在野外，使狂亂的土地的無際的原野肥沃起來。

這種主題是初期的蘇俄文學中的一個最循環的主題。舊的，沈滯的，鈍感的，老朽的，陳腐的，對新的，活動的，有力的，新鮮的，革命的。生活的辯證形成了藝術的辯證。在農村，對照是最顯著，衝

突是最富有戲劇的意味。

青年是莽撞而不講道德的。他們甚麼都知道，他們甚麼都理解。他們擯棄上帝，辱罵教會，他們不像忠順的基督教徒一樣地舉行結婚式或葬禮。“你不是我的兒子！”塞孚琳娜的“老太婆”對她的布爾雪維克的兒子說。“我不要爲了有一個褻瀆上帝的兒子而把罪孽擔在我的靈魂上。隨你的意思到甚麼地方去吧。當我們還活在世上的時候，你可不要回家來。”

“別胡說吧，母親，”涅維洛夫（Neverov）的“不走正路的安得倫”（Andron the shiftles）中的那位在紅軍裏學得了一些表面知識的青年農夫安得倫說。“人是從猴子進化來的。”

當安得倫的父親大怒地跳到他的兒子前面，問着，“你這是從甚麼聖書裏讀來的？”的時候，如下的對話發生着：

“你，爸爸，是無知識的。”

“那末這就是說你不相信教會嗎？”

“呸！教會祇是一個演宗教戲的舞臺罷了。對不起，我自己也就可以演一個角色。”

父親爲憤怒而喘着氣，他喝了一口伏特加酒去鎮靜他的神經。

“誰把你生到這世界上來的？”

“自然。”

“甚麼樣的自然？”

安得倫看見他的父親把袖子捲起來；他大笑說：

“別這樣吧，老頭子，不然的話，我就要打你了！”

“你有甚麼權利可以打你自己的父親？”

“我對母親決不這樣。但是假如你還揮着你的拳頭的話，我就要打你，不管有權利沒有權利。”

“你這婊子生的！”

安得倫抓住他的手：

“現在別開玩笑呀。我是決不會讓你打我的。我立刻可以把你綁起來……”

安得倫是家庭中的煩惱之源。“制服我的兒子吧，我又沒有這個力量，”他的父親悲慘地喃喃着說；“自己屈服吧，我又無面目對別人。”他的兒子的傍若無人的步調，他的玲瓏玲瓏地響着的踢馬刺，和紅色的罩衫，他的綴着赤星的斜戴着的帽子，他的鬆曲的髭鬚，他的外國話，他的褻瀆的言語——“人是從猴子進化來的，”“我不承認宗教式的結婚，”“我認女人做同志，”“我們必須組織公社，”等等，使得老人的靈魂充滿了苦痛與悲哀。

全村都被安得倫和他的部下擾亂了。他的影響在青年中間特別大。老年人叫苦着：“我們的兒子不聽話，我們的女兒也不聽話。他們和沒有正式結婚的愛人睡在一起，他們早晨起來也不做禱告……”不僅如此，安得倫還封閉教會，驅逐牧師，向富人課稅，沒收他們的財產。結果，當白軍襲到村

裏來的時候，安得倫的支持者大都遭遇了和蘇甫龍同樣的命運。安得倫受了傷，他的父親的屋子被燒掉了。又是肥土，爲了將在“田野裏徘徊着”的那“新的播種者”而變得更加肥沃了。

## 新俄文學中的NEP與 康 閔 立 斯 特

---

自從波蘭軍被驅逐出烏克蘭，在拉格爾的指揮下的白軍的最後的殘黨在克里米亞被勦滅，俄國的經濟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各處地方被解放以後，革命踏進了一個新的階段。在一九二一年八月，蘇維埃政府實施了新經濟政策 (Nep)。解除私人貿易的束縛的一個直接的影響，是中產階級的再興。從舊資產階級的少數的殘餘中，一羣投機商人和貿易商人——Nep men——登上了舞臺。接着來了一個放縱無度的時期，但很迅速地被康閔立斯特鎮壓下去了。

私人貿易者，私運商人，投機商人自然在新經

濟政策實施以前就存在了的。我們看見這種典型在 Nep 以前的文學中就被描寫了。比方，在取材於一九二一年的春天，即，正在新經濟政策正式頒布以前的時期的里別定斯基的小說“一週間”中，我們就可以看見這個。

“在一個車站裏，”那篇小說中的一個康閱立斯特的女子安榴達說，“有這麼樣的一個大扶梯，牠從頂到底蓋滿了人。男人們，女人們，孩子們躺在扶梯上，帶着他們的可憐的醜陋的行李，而他們的面上都有憂慮和愁苦的薄薄的蛛網般的皺紋，在許多天的污穢的遮蓋下。在接近的一個飲食店裏有一個投機商人在吃着點心，同時一個飢餓的，無家可歸的小孩垂涎地望着他的嘴……一個衣冠楚楚的甚麼委員之類的人，胸前閃耀着康閱立斯特的勳章，小心地，好像要嘔吐似地——要嘔吐似地是一個恰當的形容詞——走下這可怕的扶梯來，他很小心地把他的漆皮靴放到這一羣疲倦的，

醜陋的身軀中去，走下來和那投機商人一同吃着點心……我突然想起了在古代的羅馬，在基督時代的猶太，在中世紀，在不久以前的資本主義時代也是這樣的。我覺得異常地難過起來……我覺得我真要睡在那扶梯上，在這些人的旁邊，蓋着他們的那永遠的污穢，把他們的虱子放在我身上，睡在那裏一直到死，有時移動一下，讓路給那些光滑的靴子……”

自然，對於投機商人的嫌惡，對於他所甚至給與於康閔立斯特的腐敗的影響，勢必隨着 Nep 的實施而增加萬倍。在格拉特考夫 (Feodor Gladkov) 的“水門汀” (Cement) (譯註：蔡詠裳，董紹明譯，“土敏土。”啓智版) 中的年青的布爾雪維克的女子波麗亞說：

“我忍受不住了，因為我不能理解這個，也不能證明這個是對的……我們從事過破壞，我們忍受過痛苦……血的海，飢荒。而突然間——過去

帶着快樂的聲音復活了。我不知道惡夢到底是在甚麼地方：是在那些流血，悲慘，犧牲的年頭裏呢，還是在這輝煌的陳列窗和酩酊的酒店和盛筵裏呢。堆積如山的屍骨到底是爲了甚麼呢……難道是爲了使惡徒們和吸血鬼再來享受生活中的一切好的東西和藉着掠奪來自肥嗎？”

“我們快要遭遇一個可怕的患難了，”同一小說中的另一個康閱立斯特說，“比內戰，破壞，飢荒，和封鎖更壞。我們是在一個隱藏的敵人面前，這個敵人並不拿鎗對着我們，祇是在我們面前散布資本主義商業的一切魅力和誘惑。……小貿易商人正在從他的洞裏爬出來。他在開始漁利，而且用各種樣式再化身出來。比方，隱身在革命的言辭的壘壘後面，用一切布爾雪維克的勇敢的品性，他正在竭力把自己混入我們的隊伍裏來。市場，酒店，陳列窗，美食，家庭的安樂，和酒精……這就是我們應當害怕的地方。”

Nep 實施之後的時代的一面，被愛蓮堡在他發表於一九二五年的那篇絕妙的小說 “Rvatch”（喧鬧者）中用暗的色調描畫出來了。在這裏我們看見米哈爾立科夫，這有害的，放蕩的，利己的，無主義的，好色如命的主人公是怎樣設法把他自己混入黨裏面去。在軍事共產主義和內戰的時代，他做了勇敢和自己犧牲的事業；後來，在戰後的投機和欺詐的消耗熱的時代，他墮落得成爲了苟取的，貪婪的野獸；最後，當他的活動變得太劣跡照著了的時候，他被 GPU 逮捕，於是當作一個投機商人和背叛者而被鎗斃了。

不管作者的政治的觀點怎樣，資產階級總是當作蘇維埃共和國的敵人，或至少是不懷好意的人而被描寫着，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阿列克賽·託爾斯泰（Alexei Tolstoi）的“蔚藍的城”（Azure Cities）（譯註：劉穆譯，遼東版）中的地方上的猶太商人皮卡斯。“告訴我，”他帶着一種

反革命的低低的聲調說，“莫斯科現在怎樣？Nep怎樣？他們說甚麼都沒有希望了。這是一個可怕的時代呵。我們正陷入深淵裏。我到了一個這樣的神經衰弱的狀態，我在睡夢裏也狂叫起來。”

在同小說中，我們還認識了沙訶克·柴嘉李夫，“小麥批發商的兒子，”一個完全墮落的，粗野的，自負的青年。

和這沙訶克非常相似的一個典型是奧格列夫(N. Ogniev)的“共產主義大學生日記”(Diary of a Communist Undergraduate) (譯註：江紹原譯“新俄大學生日記”春潮版)中的學生科森季夫。“我想你一定以為跳舞是革命者所不應該做的事吧，”科森季夫對他的謹嚴的康閱立斯特的朋友說。“現在可不是顧慮這些事情的時候了。戰時共產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是生活在Nep時代。我們在旁的東西之外，還得學習經商。既然如此，我們為甚麼不也學學跳舞呢？娛樂於你的精神是很有益處

的，而且沒有理由我們都要過那修道院式的生活。而且這可以給你極好的機會和女孩子們更密切地接觸。跳舞祇是使女孩子們——融化！”但是科森季夫並不專是想着狐步舞和歡樂。有時，特別是在看了戲和飲了幾杯伏特加之後，他就變得瀟灑而多情了。於是他的想像就把他帶到那不可名狀的資產階級的幸福的世界中去。“至於我個人，”他明言着，“我是大學一畢業就要好好地去結婚。我希望有個安適的，清靜的小家庭，一層至少有三間房子的樓，和一些雅緻的傢俱——我要心滿意足地生活。”

科森季夫是很愛譏諷的。公開地，他是一個康閱立斯特；但是祕密地，他做着砂糖的投機買賣，而且跟像塗着香水的吉吉那樣的資產階級的女子發生種種的曖昧關係。“現實生活，”他哲學家似地說，“是和康閱立斯特的集會不同的……牠是不管你的甚麼意識形態的。”

關於這個，特別有興味的地方，就是以 Nep 後的時代為題材的各種各樣的作者站在他們的階級立場所表現出來的各種不同的態度。像愛蓮堡，阿列克賽·託爾斯泰，曹西欽珂 (Zoshchenko)，羅曼諾夫 (Romanov) 之類的作家祇看見大禮服，賞錢，僕人，Lip-stick，狐步舞，賭博，俗物的娛樂，街頭的賈淫，橡皮樹，葵樹，葡萄酒，向日葵子，黃色的家庭照片，無謂的閒談，無謂的積蓄，無謂的驕傲，阿諛，諂媚，黑幕，醜惡，卑鄙，和齷齪依舊在蔓延全俄國。照他們看來，過去甚至還沒有開始消滅。地方的俄國，“肥臀的俄國，” 僅僅稍微被這巨大的革命攪亂了一下。牠祇是變得更加粗鄙，更加無情，更加輕傲了。這些中間階級的作家們是帶着一種受虐狂的快感鞭撻着資產階級。這些作家的資產階級的本質在消極性，懷疑主義，諷刺，非理性主義，以及反社會的個人主義中自己表現出來。這些作家並不排斥康閱立茲姆；反之，他們為康閱

立斯特的理想的“失敗”而悲傷。“往年的夢想到哪裏去了呀？”中間階級的作家這樣地悲歎着。完了，消失了……“我們的”夢變成了一場惡夢；“我們的”英雄變成了 Nepman，投機商人，官僚。墮落了的，利己的，燃着所有慾的人間性獲得了可悲的勝利。康閱立斯特抗議地說，同路人的眼淚是無益的，他們的悲歎是徒然的，並且說，雖然有危險的要素存在，但是康閱立斯特們並沒有失敗；反之，他們是健全強壯，而且在勇敢地繼續鬥爭。但是這些作家目擊了一場悲劇，便覺得不哭是不愉快的；他們決心要這樣地悲傷下去。自然，他們的態度是有某種客觀的基礎；但是且觀察一下格拉特考夫與愛蓮堡對於這同一情形的反應的不同吧。無產階級的格拉特考夫，如我們在引自“水門汀”的那一段話裏所見的一樣，是充分地意識了 Nep 的萬一的危險的結果；但是他的力點是完全置在無產階級的勝利上；他寧願敲着主要的音調；他是徹頭

徹尾的康閱立斯特。反之，中間階級作家愛蓮堡，雖漠然地而且冷淡地意識了共產主義的成功（如對於共產主義者亞鐵姆·立科夫的那無生氣的而且懷着敵意的描寫），却寧願強調着 Nep 的破局的結果，寧願敲着那次要的，懷疑主義的，敗北者的弦。他們兩人都是強調着他們所想要強調的東西。

## 新俄文學中的 重建與工場勞動者

---

在俄國，我們常常聽到像“經濟戰線，”“政治戰線，”“文化戰線，”“家庭戰線”(意即新的家庭和新的婚姻關係的問題)這一類的名詞。在最近數年間的大部分的重要的小說中，我們看見了在種種的和平的“戰線”上再“努力地活動着”的勞動者。妨礙積極的康閔立斯特的勞動者去努力轉動產業的車輪的一個最傷心的事實，是一部分的最熟練的勞動者以及許多的智力較低的勞動者的愚鈍和猜疑心。真的，康閔立斯特似乎陷入了一個致命的兩難之境——一方面農民不獲得工業生產品的供給不肯把他的穀物讓與別人；而另一方面，許多的

勞動者不得到充分的食物不肯工作。雙方都不合理喻。固然對於農民可以至少暫時地施以強硬手段，但是如果對於工廠和工場裏面的囂張的勞動者也用強硬手段的話，那就等於自取滅亡。對於後者祇能予以遷就，逢迎，和勸誘。往往，鼓動不願意的，頑強的勞動者全體去復工的，是工場中的一兩個人的難於抵抗的，火一般的熱情。我們在利亞西珂(Liashko)的“鎖鍊之歌”(The Song of the Chains)中所見的就是這種場面。

“工場在整整的一個冬天中充滿了一種不吉祥的情調，一種使大家的心裏懷着疑惑，失望，和冷淡的情調……有一天，在春天裏，號笛反常地嗚咽着，旋盤停止，鋼鐵沉默。勞動者們潮水一般地湧到工場去，走向演說者在上面向他們演說的足臺，要求去見指導者，蘇維埃的代表者，並且向他們喧鬧起來。

“你們要我們幹嗎？……我們是爲甚麼而工

作呀？’

“麵包在哪裏呢？…… 你們爲甚麼祇拿希望來欺哄我們呀？”

“你們甚麼事情都要沾手，但是你們甚麼事情都不能做。”

“憤怒和痛苦充溢在他們的眼睛裏，使他們的拳頭捏緊起來，——說着激烈的話，大聲嚷鬧着。他們咒罵，他們互相責備，他們尋找罪人——但是他們尋找不出來。”

同樣的情形被描寫在謝景琳 (Marietta Shaginian) 的“三架織布機”(Three Looms) (譯註：趙景深譯，載“蘆管”中，神州版) 中，在那裏面，列甯格勒的紡績工場的婦人勞動者反對由原來的管理兩架織布機改爲管理三架。“婦人們都怒容滿面，”作者敘述着。“她們的臉都紅了，她們的眼睛閃閃有光。這是好像二加二等於四樣地明顯……她們不願管理三架織布機，她們決不會爲巧妙的理由所動，而最後

她們是會斷然地反對這提案的。”“我們挨了這樣的辱罵，”作者繼續着說，“我們的不慣的心嚇得變成兔子一樣了。”但是，在這兩篇小說中，勞動者都終於復了工，這是值得注目的。同時，非常有意義地，在這兩個場合，復工都是由於一個老勞動者的激昂的演說。這些老勞動者在舊制度之下受苦受得太多而且太久了。沒有甚麼東西比過去更壞。他們的議論的主旨就是：“決不向後退……我們應該自己做我們自己的工作……”

在尼濟佛洛夫（George Nikiforov）的“伊凡布立達”（Ivan Brynda）中，被迫離開了他的做慣了的工作，離開了他在那裏工作了三十五年的工場的老織工願意犧牲他和 Nepman 所訂的有利的雇用契約和更多的東西，祇要他能夠再在早晨六點鐘起來，應着汽笛的聲音在他走了三十年的那條走熟了的路上一疾步地走着的話。但是，雖則對於工場懷着無限的愛意，然而一想到過去他就充

滿了恐怖。當年老的織籃者遺憾地講着良好的過去日子的時候，布立達叫道：“我是在工場裏生的；我知道。那簡直弄得一個人不能夠自由地呼吸呀。他們使得你難堪極了，那些該死的傢伙。工頭常常給我耳光。不，先生，我是決不會忘記那個的。我與其再爬到那依舊的束縛下去，是甯願死了的好。”在最後一章裏，尼濟佛洛夫描寫着布立達在回到他的故鄉的城市去，再一次聽見工場汽笛的尖銳聲的時候是怎樣地歡喜。

勞動者對於工場，機械，生產過程的愛着是無產階級文學中的一個支配的主題。就是很熟練的勞動者，那些在舊制度之下繁榮着，對於新的秩序和新的管理法輕蔑地眺望着的人們，對於工場的復興也不能不大為感動。這種典型的勞動者很出色地被描寫在塞米洛夫 (Semyonov) 的小說“拉達立亞·塔波華” (Natalia Tarpova) 中。老金屬勞動者，拉達立亞的父親，雖然被工場內的新的空氣弄

得十分憤慨，在他回到他的機器面前的時候也感到非常歡喜。

對於年老的而又極熟練的勞動者的另一個非常明確的描寫可以在里別定斯基的“一週間”中看見。

“哦，可是，現在這些都完結了，”勞動者安特列夫在詳述着勞動者在過去所受的壓迫的那可怕的狀態之後這樣地說。“舊的永遠不再有了。塞爾吉·查哈立基（他的舊雇主）現在也許在日本，也許在美國。而在他的工場裏我差不多是一個主人。”

安特列夫是工場委員會的委員長。在他的關於工場的不活潑的勞動的那段談話中，我們很明顯地可以看見妨礙無產階級努力發動產業的車輪的一切障害物。“勞動者怠着工，食糧很壞，而且不是按規發的，發工資的方法也笨極了，機器是舊的而且壞了的。”加之，勞動者還不知道怎樣管理工廠，而安特列夫也祇得承認“我們不妨從舊廠主學

習”，那舊廠主雖然是“苛刻而又狡猾，並且愛用威權，”但是他却更愛工廠，整天整夜地在那裏度過，熟識工廠裏的每一架機器，知道每一個勞動者如何地工作，而“最重要的是他有思考力，經營上和商業上的思考力。”安特列夫又對於現在的官僚主義的工場監督，技師兼康閱立斯特，作了一個非常生動的描寫。“他從來不走出他的辦公室一步，而且同化於黨外的專家了。一個對一個，我還能夠跟他辯論一下，但在會場上他一下子就抵得我說不出話來。我不知道甚麼時候可以請求發言，甚麼時候不可以，而他一下子，“當衆動議，”便洋洋灑灑地說了一大篇。我覺得他是在說謊和作偽，但是我不能夠辯倒他，而且就是我勉強發言，我講起話來也好像我的舌頭被繩子縛住了似地笨拙。”

以再建的初期中的勞動者和他的問題為題材的傑出的作品，是利亞西珂的“熔鑪”（Furnace）和格拉特考夫的“水門汀”。就連標題都是暗示着

蘇聯的工業的方向。但是這些小說並不是純粹地工業的；那就是說，牠們並不僅祇是涉及生產的再建的事業而已。在這裏，除了“經濟戰線”之外，我們還有“家庭戰線”和“文化戰線”。工業的復興是和家庭問題以及夫婦間親子間的關係交織着的。在這兩篇小說中，我們看見內戰中的英雄回到他們各自的工場，祇見一切都陷於疏忽和荒廢的狀態。他們遇着了勞動者的頑固的不滿，黨外專門家的怠工，康閱立斯特的組織裏面的官僚主義。最後，他們畢竟把勞動者組織得成個樣子，把工場內的工作的秩序也恢復了。

但是勞動者的野心擴大到僅僅把舊的工場恢復以上了，他實際上正在努力把全國工業化，把僻遠的農村電氣化，並且把超現代的交通機關擴張起來。他並且更進一步地努力設立廣汎的公共廚房，嬰兒養育所，平等，的賃金等等，以解放婦女。近代的無產階級的英雄不是怎麼樣了不起的戰士，

詩人或大力士。他是工業家，科學管理人，能夠計畫和實行生產，機械化，合理化的偉大計畫的人。像阿列沙(Olesha)的“羨望”(Envy)中的中心人物一樣，能夠改良臘腸的品質而且同時使牠的價格降低幾個哥貝克的那樣的人，是比交響樂的作曲家更為偉大的英雄，更受人讚賞和景慕。

## 新俄文學中的 官僚與專家

---

如果說中產階級分子混入共產黨是一般的現象，則這樣的分子混入工業上和商業上的監督和委員的地位是差不多不可免避的。無產階級“有一切力量的源泉，但是他知道得不夠。”他需要在種種分野上的熟練的人，專家，技師——而這大部分又祇能求之於那些受過教育的恩惠的人；就是說，那些上流和中流階級的人。

在書裏面，黨內的官僚和黨外的“Spets”（專家）是跟 Nepman 非常相同的。關於這個，蘇俄的文學提供了許多的例證。雖然許多專家和官僚是共產黨員，但他們心理上是屬於過去的。雖然歸

屬於黨，但他們在一切的意圖和目的上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在他們心中的早年的理想主義一點也沒有殘留了的，沾沾自喜的，肥胖的，目滿的個人主義者。在辦公室裏的千篇一律的工作，對於大衆的隔絕，相當的經濟的保障，家庭的安樂，美麗而又善於社交的妻子，兒女們——這一切很容易使得一個人株守，柔弱，墮落；牠挫折他的革命的勇氣，牠遏止他的自我犧牲的熱情。漸次地，常常是不自覺地，他被吞沒在資產階級的幸福泥沼裏，於是他把康閱立茲姆和革命拋到九霄雲外了。雖有經常的自我批判和嚴格的清黨，但是這個致命的病患並沒有充分地被制止。官僚主義終於成爲了所有的階級中的每個明白的俄國人所特別歡喜攻擊的一個妖怪。

拿羅曼諾夫的小說“星”(Stars)爲例吧。在這裏，我們看見兩位久別重逢的內戰時代的英雄，培迪亞和華西亞。在離別的期間內，農村少年培迪

亞，不爲饑餓和貧窮所阻，入了莫斯科大學，沒頭於科學的研究，而且，雖依舊是饑餓和襤褸，正在好好地成爲第一等級的星。但是華西亞却採了不同的途徑。他做了地方委員會的委員長，結了婚，組織了一個安適的家庭，備置了高價的傢俱，在他的小屋的周圍開拓了一個花園，長得很肥胖了——大腹，二重顎和粗顎——有一個僕人，一駕可以隨意使用的精緻的馬車，一駕“適合於地方蘇維埃主席”的馬車。最初，他很歡喜把培迪亞帶到他的家裏去。培迪亞在他的心中喚起了許多關於英雄主義，犧牲，成功的光榮的回憶。但是後來，當華西亞的妻，從宴會裏回來，看見他的丈夫的這位襤褸的客人而感到不快的時候，華西亞的熱情便消失下去，於是他開始痛苦地意識到他的朋友的那不雅觀的外貌。一種對於舊同志的忠實的漠然的感情使華西亞非常不安。他甚至爲了他的原故而和他的潑辣的妻吵嘴。但是當他一注意到培迪亞

的討厭的外貌和心不在焉的樣子給與了他的宴樂的賓客們以不愉快的印象的時候，這種感情便立刻消失了。數日之後，客(培迪亞)願意走開，而主人(華西亞)則更願意他走開。

在蒲珂夫(Puchkov)的“蘋果”(Apple)中，我們看見“Spets”，鑛山中的一等技師，坐在汽車裏到處馳騁着。這位紳士“以前是鑛山的股東，現在他儼然一個“Spets”樣地坐在辦公室裏，在他旁邊的他的兒子也是身居技師之職……他們生活——他們簡直是浸潤在牛乳裏……”對於“Spets”的這種態度自然和格拉特考夫對於他的技師克萊斯特的態度完全不同。不過就是在格拉特考夫的“水門汀”中，克萊斯特也是一個例外，其餘的專家，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是同蒲珂夫所描寫的一樣。

在蒲珂夫的這篇小說中，我們還看見了康閔立斯特的官僚——地方委員會的祕書——希西伯格同志的極其辛辣的姿態。“他是陰沉的，喋喋不

你的，帶着一雙懷疑的眼睛——好像他周圍的人都是騙子。這是很顯明的，他手裏從不曾拿過鑊子。他是那些狡猾的惡漢中的一個。但是講到搖唇鼓舌或舞弄文墨，那確是他的拿手好戲。”密特加，講述這故事的勞動者，看了“Spets”和希西伯格就覺得作嘔。在一個勞動者的集會上，他表示他對於鑛山內的情形的澈底的嫌惡。希西伯格……開始呼喚着……向四方八面唾着……搖着他的稀少的頰鬚……一個真正的小狗。他叱罵密特加，叫他做“惡徒，欺詐者，反革命者”；他宣言着專家是“不可少的人”，他們是非得被擁護不可的；他終於用謀略戰勝了喜愛吹毛求疵的密特加。“我真是難受極了，”密特加說。“哦，你這小老鼠，”他想，“在戰線上我沒有看見過你；在鑛山裏我沒有看見過你，而現在講雄的是你，不可少的人也畢竟是你而不是我。”

同樣的一羣“Spets”和官僚被描寫在格拉特

考夫的“水門汀”中。英雄的勞動者契美羅夫努力恢復水門汀工廠，但是他的努力差不多全被專家和官僚的怠工戰術破壞了，於是，他便對水門汀工廠的一個助監督，一個有着“銀色的剪短的鬚鬚”，“金緣的夾鼻眼鏡”和“鑲金的牙齒”的紳士說：

“不要對我這樣胡說八道吧。我完全知道你們的所有的陰謀。我不會爲了你那漂亮的面孔而放過這一件事呀……你拿我當傻瓜，想要欺騙我……現在我就要打破你的腦袋和肋骨！”另一個勞動者叫道：“非把他們撲滅不可，這班私生子！把他們沉到海裏去吧，這班狗東西！這是一班夢想沙皇的統治的舊黨徒呀。他們是在等待着他們的舊主人呀，這污穢的豬！他們通通該鎗斃！從他們身上是希望不出甚麼好東西來的。”康閱立斯特的官僚也一樣地不被寬容。“官僚主義正在使我們陷於滅亡，”一個老勞動者叫道。“官僚主義。我們還未來得及埋葬我們的同志的屍體……他們的血還沒有

乾……而我們便已好像將軍一樣穿着都麗的馬袴坐在私室的安樂椅上。儀式——事件表——房門上標着“閒人免入”……我們不久就要恢復“閣下”的稱呼了！我們先前有過同志。他們現在到哪裏去了呢？我覺得勞動階級又被壓迫而且不幸了……”

Nep 以後的時代的精神在許多其他的作品中被描寫着。在柯侖泰(A. Kollontai)的“赤戀”(Red Love) (譯註：楊驥譯，北新版；溫生民譯，啓智版) 中，我們看見康閱立斯特的武納機密爾陷在安適生活的不可捉摸的網羅中。他的妻，一個忠實的康閱立斯特，在幾個月的離別之後，回到他這裏來，看見他過着奢侈的生活：地毯，帷幔，絲被，衣櫃，燈臺，畫，鏡子，僕人，她被驚駭了。“我不是爲着我的小愛人築成了一個可愛的小小的巢嗎？”他自負地說，“哦，你知道這些傢具現在要值多少錢嗎？好幾萬萬呀！你真以爲我做經理的薪水能夠使我買這樣的奢華的傢具嗎？一切這些東西都是別人供給我的。我真

幸運，在我來的時候恰好能夠由友人的幫助從當局手裏得到這些傢具。現在這可辦不到了。現在，無論誰也不能夠把他的家這樣裝飾了。除非他有現錢。此外，在冬天裏我自己還買了一些東西。”

武納機密爾愉快地，滿足地列舉着這些東西。他的妻子的眼睛漸漸變得冷淡了；牠們爲憤怒而閃耀着。她疑心他有甚麼不正當的行爲。但是他却天真地對她說他的薪俸是足夠敷衍這些用度。“你的月俸？”她憤怒地叫道。“但是你，一個康閱立斯特，怎敢把牠花在這些廢物，這些勞什子上面呀？貧窮正在增大着！到處都是悲慘和貧窮！還有那些失業者——你把他們忘記了吧。哦，經理先生，你肯回答我嗎？”武納機密爾並不屈服；他想要開導他的妻華西亞，用溫和的手段說服她。他對她大笑着：“你好像屋檐下的麻雀樣地生活着，全不曉得金錢是有怎樣的用處。別人賺着更多的錢，而且過着全然不同的生活。他們纔真是闊氣呢。”

的確，被描寫在蘇俄文學中的有些康閱立斯特的官僚和赤色的工業監督是“很闊氣的”。寒米洛夫的小說“拉達立亞·塔波華”中的赤色監督。阿列克賽·伊凡諾維奇，努力收集了許多稀有的書籍，美麗的繪畫和珍奇的古玩品。同小說中的一個優秀的康閱立斯特，在和他的康閱立斯特的愛人溫存了幾小時之後，這樣地對她說：“我等候你有兩個禮拜久了……現在，聽我說，你退出組織吧。”“退出甚麼組織？”她驚愕地問。“退出黨。”“可是我以後怎麼辦呢？”拉達立亞·塔波華問，感覺得血湧到她的頭上來了，不肯相信她自己的耳朵。“你做我的妻，做一位有趣的太太。”“他這是講的甚麼話呀？”塔波華自問着，還是不肯相信她自己的耳朵。但是她的愛人繼續着說：“我真不能想像我自己和一個女黨員同居。你自己想想看吧：我在七八點鐘之間回到家裏來。我的妻出去了。九點，十點，十一點——她還沒有回來。一點鐘——她從集會回來

了。疲倦倒了。她沒有心情來應付我了。但是我在黨裏面幹了十二年<sup>五</sup>了！我也應得在家裏來休息一下。在我的家裏，我需要着溫存，安樂，和一個可愛的妻來迎接我。”……“多混蛋啊！”塔波華暗自想道。

在里別定斯基的“委員”（Commissars）中，我們又看見某些重要的康閱立斯特的委員從共產主義的完全無缺的筆直而窄狹的路中脫落了。佩着赤旗的徽章的康閱立斯特的英雄，那些忍受過寒冷和飢餓，而且毫不畏縮地直面過死亡的人們，現在成爲資產階級的奢侈的毒害之犧牲了。

在阿列克賽·託爾斯泰的小說“蔚藍的城”中，勞動者布志立洛夫，一個夢想家，一個詩人而又是一個內戰時的英雄，一見蘇維埃的官僚烏迪夫金，一個“光棍”，“一個色鬼”而又是“我們的最好的狐步跳舞家”，便起了嫌惡之感。在浪漫的布志立洛夫看來，官僚的烏迪夫金，他的吃燻肝，吸紙煙，和

在他的大鼻子底下微笑的那種樣子，從他的嘴巴的這個角上擴張到那個角上去的那自滿的貓笑，簡直是象徵着不可言說的俗惡，革命似乎正在沉到這俗惡的海裏去。

## 新俄文學中所反映的 一九二一年後的知識階級

---

跟着內戰的終結和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在知識階級或至少在捱過前幾年的苦難而勉強活了下來的那一部分的知識階級的生活中也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三個過程是很顯明地可以看見：分裂，適應，和同化。超然遠處，怠工，使用積蓄下來的財產成爲非常困難了。對於外國的干涉的希望也完全破滅了。在另一方面，再建的時代，跟貿易的復活一道，給了中間階級的殘餘的部分一個參加國家的復興的機會。飢荒的年歲和日常的安樂的缺乏給了他們一個難忘的教訓。他們變得非常實際了。現在使他們最感興趣的就是利潤，薪金，報酬，

額外工作費。他們的生活的唯一目標就是動物般的安樂，一間住房，一個可以糊口的位置。照奧格列夫的“共產主義大學生日記”中的教師阿茲戈夫的話講起來：“他們變得這麼無情了，爲了錢的原故不惜割開別人的咽喉，用陰謀陷害別人，匍匐在權威者之前，抓取他們所能夠抓到的一切東西，就是坐牢也不要緊，祇要出了牢可以再做。”一句話，這些以前的知識分子已經放棄了他們對於精神的卓越與文雅的最後的權利，而成爲這異常混雜的，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Nep 實施後的社會裏的新的橫行的，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的不能辨別的部分了。雖然知識階級的大部分——敏感的，固執的，適應性較少的——都逃的逃了，死的死了，然而其中的比較圓滑的分子却努力使自己適應 Nep 時代的新的環境，或是使自己完全同化於支配的康閱立斯特的無產階級的集團而失掉自己的個性。

當作一個集團的知識階級曾經盡過“文化的推進”的職務。革命把他們的這個高尚的職務奪去了。現在建設着社會生活的新的秩序，新的形式的是勞動階級。實際上，知識階級已經沒有了。“牠已經完全消滅了，像紳士，貴族，和舊官僚一樣，”舊的革命的知識分子阿茲戈夫叫苦着。“現在祇有Nepman，專家。和蘇維埃官吏，和新的律師，但是舊知識階級是已經沒有了，永遠沒有了。”

這是值得注目的，就是在知識階級的異端的峻烈的迫害的時代，詩人布留索夫，雖是一個真實的共產黨員，在他用如次的詩句同情地論及知識階級的時候，也表示了一種同樣的態度：

祈禱，爲節日的薔薇祈禱吧，  
爲純潔的百合，哦，祈禱吧！  
爲蟋蟀的懶惰的姿勢，  
爲詩人所做的夢，

爲不中用的，沒出息的，哦，祈禱吧！

在菲丁的最近的小說“兄弟”（一九二八）中，我們聽見可愛的老教授亞塞尼·亞塞立維奇·巴哈在和一個康閱立斯特談話的時候也發出了同樣的感慨：

“當我在尼瓦河渡過的時候，”他明言着，“我又開始覺得，正在這麼不可挽回地從生活中消失的人，這個人是和新的入一樣地值得讚賞的。我們不懂得你們所將要創造的那種美。我們也不懂得你們將怎樣地感覺着你們的那種新的美。但是我們的感情是無論如何不會再有了，因為我們那個時代的人是無論如何不會再有了。但是我們也知道怎樣地感覺，羅蒂，我們也創造出了美的東西，而且爲牠弄得消魂蕩魄了！使我傷心的，羅蒂，就是新的人們竟這麼毫不留情地把我們從生活中拋了出去。這真可悲呵；因為我們這個典型的完全

消滅對於將來的損失會像動物學的標本的完全消滅對於科學的損失一樣大呢。我們富於感情，你們之非難這些感情，並不是因為牠們是有害的，而是因為你們缺乏牠們，因為你們不肯認識牠們的重要……難道說新的人間會永遠，永遠對於我們的——哦，請你聽我說吧，羅蒂——這裏（叩着他的胸）一點兒觀念也沒有嗎，這裏面難道一點兒美的東西都沒有嗎？難道說這個會永遠為你們以及那後代的人們所忘却嗎——不會的！我們有權利把我們心靈的所有的偉大的震動保留下來傳給你們！……”

這是非常痛心的話。老教授漠然地意識着降臨到這個大地上來了的新的人間和新的美！行動，運動，論理，科學，摩天閣……但是冥想，寂靜，內省怎樣呢——這些價值都值得保留嗎？牧歌的“貴族的巢”和可愛的“櫻桃園”怎樣呢——這些都注定了滅亡，湮沒嗎？

教授做心理學的二元論的犧牲是太年老而且對於過去太根深蒂固了。他是完全屬於過去的，他依然是他的時代的神的忠心的崇拜者。更悲慘得多的，是恰當自甘死滅則太年青，若完全變容則又太年老的那樣的年齡中捲入在革命裏的那些真實的知識分子的命運。“革命正在我們中年的時候降臨我們，”謝景琳在她的論文“新的生活與藝術”(The New Life and Art) 中說。“我們加入勞農少年團(十六歲以下的少年男女的共產主義的組織)自然是太遲了一點；反之，我們就這樣退到爐邊去吧，則又未免太早了一點。”爲過去所教養成的，纖細的，頹廢的，內省的，這個“優秀的知識階級”到底不願從生活的舞臺退去，不願跟老教授巴哈同聲說：“我們不懂得你們所將要創造的那種美，我們不懂得你們將怎樣地感覺着你們的那種新的美。”就這樣地在新的人間的面前自暴自棄。反之，他們極要知道，極要學習並且使自己適應起

來。

“讓我們接近你們，更和你們親近吧。”謝景琳向新的人間訴說着，“讓我們接觸從你們的根柢裏所生長出來的東西吧。”給我們一個選擇的機會，不要把我們當做“美麗的約瑟夫，”——“約瑟夫也許終於愛了波迪華的妻子的，假使她沒有連忙打斷他的意志的衝動，假使她沒有奪去他的選擇的自由的話。”

作者的熱烈地表示親善，她的“讓我們接觸從你們的根柢裏所生長出來的東西吧”的請求，代表着許多知識分子的一般的態度。他們熱望得到新的經濟關係的支持，渴望被吸收在新的人間裏面，以接觸現代生活的源泉來改變他們的那種死氣沉沉的狀態。他們的大部分是失敗了。過去的重荷是太沉重了。我們在那些在紅軍裏打過仗來的知識分子中就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在戰場上，他們的優雅和敏感也引起了懷疑和諷刺的評語，這個便轉

而容易使得他們對於他們所嚮往的階級疏遠起來。和平和新經濟政策也沒有改善這種情形。“由事勢的必然的歸結，這些人們被置身於哈孟雷特的難境中了；他們被釘在十字路口，而生活正在從他們面前奔馳過去。……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能夠做甚麼呢？……我們這些參加了革命的知識分子是結果都要被釘死的——不是被中央政府，而是被民衆自身釘死！……這些破滅了的知識分子不能不自己問自己：在呢還是不在呢？活着呢還是不活着呢？……是的，你可以活着，假使你周圍的人都愛你，信託你，而且聽從你的話，注意你的行動，這些在他們看來就是你對於人生的忠實態度與對於進步的慾望的結果。但是假使旁人對於你沒有信仰，沒有愛，沒有信賴了——你就不能不自問：在呢還是不在呢？於是自答道，不……我們是在監牢裏，一點空氣也沒有……我們是甚麼呢？一個割斷了的腕，一個無用的斷片，一片空虛，精神

上的逃亡者。”(共產主義大學生日記)

難怪“日記”中的那年青的知識階級的詩人夏霍夫自殺呢：他是一口有角的釘，他不能夠嵌入新的組織裏面去。在他寫給他的康閱立斯特的友人的信裏，他羨慕地說：“你是個不露鋒芒的人；你是個圓圓的而又油滑的球，可以像槌球一樣通過一切的門……我是個三角形。一隻角是在過去，另一隻是在現在，而第三隻是在未來。我不能擺脫過去(我是個皇子)；我不能把握現在(我是個貴族的墮落者)，而未來是渺茫的(這是我的哲學的思考的論理的結論)。”

又難怪羅曼諾夫的“生的權利”(Right to Life)中的阿斯泰金也自殺呢。可憐的阿斯泰金，新聞家，是這麼熱心，他是這麼拚命地想抓住他們(新的人間，康閱立斯特)所需要的東西，以致他全然忽視了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而開始寫出誰也不需要的無意義的東西。”

歷史就這樣地把舊知識階級打得粉碎了。不能適應的人們以自然的死去或自殺而從生活中消失了；在那些依然活着的人們中，祇有極少數的人在這壓倒地新奇的世界中英雄地保持了他們的本質。其他的人，比較地少數，在經過了一個歇斯特里亞的徬徨的時期之後，終於感覺到，自然是不完全地，自己是處在新的生活中了。他們似乎終於接觸了那“根柢”。他們是和無產階級站在一道，他們跟着無產階級的路走，“沒有嘲笑，也沒有別的動機，也沒有孔雀的羽毛地——他們全心全意地把他們的唯一的資本——頭腦獻給革命了。”這些大部分是卑微的人——教師，醫生，技師，檢查官，農業技師和其他等等。在極少數中，我們看見教授，作家，科學家，畫家，戲劇家，等。

這些知識分子已經忘却他們的痛苦了。他們在不可避免的事情之前低了頭，以看到了新的人間，新的生活，新的美而自慰。“我沒有感到我的年

紀，也沒有感到快要到來的死，塞爾吉，”理定(Lidin)的小說“青年”(Youth)(譯註：蓬子譯載“奔流”二卷五期)中的有名的老革命知識分子伊喀托夫對他的老友耶茲夫教授說。“這祇是小事情罷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和我都沒有白白地度過我們的生活。這就是我所要說的話。你在科學上，我在革命上。跟在你的後面有學生，你的門徒的時代。跟在我的後面有被革命喚醒了的無數萬的，無數萬的建設者。”在耶茲夫教授對美貌而年青的蘇維埃飛行家所說的“代替我們的地位的正是你們青年呵”的那句話裏，有着一種信任和歡喜的調子。老教師阿茲戈夫向他的康閱立斯特的學生說：“你知道我是陷入了怎樣的難境。我簡直是在一個毫無出路的窮巷裏呀，……你和你的朋友幫我在一個我已經迷了路的世界中找到了我自己……”他也是很顯然地從“根柢”裏接觸了新的人間，他的最後的話便是：“奇怪，可不是嗎？總之，我是很快樂的…

……”同樣地，在羅曼諾夫的動人的故事“烽火”（Beacon Lights）中的那有名的歌手，當他終於由和一羣優秀的農村教師發生了密切關係而開始認識這年青的時代是新的生活和新的美的執炬者的時候，也放棄了他對於新的野蠻人的輕蔑。火炬輝耀着，誘惑着，叫喊着……獨自在雪的荒野裏，這愉快的旅行者低聲地說：“時時向着光明，而且到處向着光明，而且直到最後還是向着光明……”

但是在現代文學中描寫從“根柢”裏“接觸了”新的人間的知識分子與勞動者之間的這種親善的一段最美麗的文章，是在格拉特考夫的“水門汀”中的以前的激烈的反革命技師克萊斯特和康閱立斯特的勞動者格萊勃·契美羅夫終於以優秀的人間，以社會的有用的分子而互相尊重起來的那個場面。

有一天，正在視察在各處灰塵迷漫的建築物

中進行着的修理工程的時候，在勞動者的踏踐和叫喊中，格萊勃遇見了克萊斯特技師。這位技術家的眼睛中的奇特的凝視時常使格萊勃吃驚。牠們帶着感情和熱心的質問燃燒着。克萊斯特輕輕地挽住他的臂，他們走向高架橋上去。他們並肩走到他們在那可紀念的晚上互相見面的那個高塔的露臺上去。在他們右邊，在下面，第則爾機在喃喃作響，隱藏在深處的發電機低聲地歌唱着。在建築物的頂上，勞動者的影子在爬行着，渺小得如同洋娃娃一般。鋼板帶着迴聲響震；鐵錘像小鎗和大鼓一般打動。建築物的窗子不再有黑色和缺口，祇有光輝和顏色——反射着蔚藍的天空和火紅的太陽。

格萊勃拍拍克萊斯特的肩膀，大笑起來。

“哦，技術家同志！一切進行得很好。倘若一個傻瓜說，我有力量，他就不再是一個完全的傻瓜了。那末，假如他前進不已，一點不遲疑，他就是一個聰明的傻瓜！我們康閔立斯特像傻瓜一般夢想；

但是畢竟不很壞，技術家同志。在革命紀念祭的時候，我們就要鬧動這個帶着火和煙震動着的巨大的東西。”

克萊斯特技師勉強地微笑；他還保持他往時的尊嚴和自大的態度。突然他抓住格萊勃的手。

“契美羅夫，我請你忘記我對於你和其他勞動者所犯的罪惡。我一回憶到我曾經陷人民於死亡和痛苦，我就一點也不能安甯。”

克萊斯特帶着恐怖和希望凝視着格萊勃；他不能抑制他的兩手的顫抖，也不能把他的頭挺直和穩定。

格萊勃向他正視，兩眼銳利地閃耀着。他的面孔突然變得呆板，固執而可怕，好像死屍的面孔一般。但是這祇有一個瞬間，隨即他的牙齒在一個微笑中露了出來。

“技術家同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過去的了。在那些日子裏我們彼此都下了毒手。但

是要記住這一點：假如你在那時沒有拯救我的妻子，到現在恐怕連她的骨頭也沒有遺留了呢。現在你是我們的一個最好的勞動者——優美的智能和黃金的手。沒有你，我們恐怕甚麼也沒有做成功吧。祇看看在你的指導下我們已經完成了一種怎樣的驚人的工作呵。”

“我的親愛的契美羅夫，我決意貢獻我所有的知識和經驗——終我一生——給我的國家。除了同你們大家一起的生活，我沒有另外的生活；除了我們建設新文化的鬥爭，我沒有另外的工作了。”

格萊勃第一次看見克萊斯特的眼睛裏充滿着眼淚，從這眼淚裏從來看不見的深處也成爲明顯的了。他眼中所含的意義是比他的眼睛，比他自己還要偉大。

格萊勃握住他的手，大笑起來。

“那末好的，赫爾曼·赫爾曼羅維奇，我們做朋友吧！”

“對的，契美羅夫，我們就要成爲朋友吧。”

於是，技師帶着穩定的步調走開，靠在他的手杖上。

## 新俄文學中所反映的 一九二一年後的農民

---

在 Nep 前的農村中的革命形勢的一個顯著的特徵，是在革命的初期，在農民中間傳播了都會的理想的那些康閱立斯特的新信徒或是死了或是往往跑到城市裏去了：蘇甫龍和維里尼亞被殺死了，安得倫受了致命傷，而馬麗拉和紅軍一道退去農村了。這是可以適用於大部分的初期小說的。西斯珂夫(Shishkov)的“鶴”(Cranes) (譯註：劉穆譯，載“蔚藍的城”中，遼東版) 中的達蒂安娜被農村的黑暗逼得絕望了，跑到城市裏去“尋找她的前程。”羅曼諾夫的“黑豆餅”(Black Fritters) (譯註：同前) 中的安得列把他的妻兒丟在鄉村裏，跑到城市裏去，在一個大工

廠裏做了一個重要的人。塞孚琳娜的老太婆 (Old Woman) (譯註:同前) 中的安迪普離了他的父母的家, 移居到城市裏去。馬拉西金 (Malashkin) 的“右側之月”(Moon From the Right Side) 中的達麗亞爲了要受都市的感化而離開農村。以這個爲主題的小說還可以舉出許多來。那些感染了都會的病毒的農民或是被農村殺掉了, 或是被當作一個有害的而且不可同化的毒素而驅逐出境了。

我們從最初便看見了兩種巨大的, 基本的力量, 兩種互相反對的文化, 雙方都不肯和解, 不肯讓步——都會對農村, 城市對鄉野。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使得這個衝突更加顯明了。農村, 雖已根本動搖, 依然是舊的農村——僧侶, 巫醫, 富農; 貧窮, 原始的農業, 無知。康閔立斯特的電氣化, 機械化, 集團化的夢想大部分還祇是一個漠然的願望。還是有許多農民厭惡康閔立斯特的農業機械化的計畫。這種心情是這樣地堅固, 牠至今還在一部分的

最有天分的農民作家的作品中，特別是在克留夫（Kliuev）和克里訶夫（Klychkov）的詩歌中找着牠的有力的表現。雖然克留夫和克里訶夫也寫過革命的詩歌，但他們對於革命的觀念是純粹地農民的，國家主義的，宗教的觀念；他們所想像的樂園是純粹地農村的，俄國的，基督教的樂園。照他們看來，真正的解放的力量不是技術，不是都市，不是無產階級，而是基督教的謙讓，家長制的家庭，舊的農民。耕種機也許可以齎來更多的麵包，但是牠會把一切的美和“幽靜”從鄉村中掃去，牠會把柔嫩的樺木投到湖裏，而且會給予農村一種連最強烈的酒也不能夠解除的那樣的苦痛。他們認為有天分的農民詩人葉賽林（Yessenin）的悲慘的死就是都市的破壞的，墮落的影響和兩種矛盾的力量的冰炭不能相容的一個無可否認的證據。葉賽林的詩歌和葉賽林的戀愛，葉賽林的生活和葉賽林的死，他們以為，便是在痛苦中的靈魂——

在機械，汽車，飛行機，波西米亞，無線電，爵士音樂的迷宮中的野性的農村少年的一個激昂的，尖銳的，破碎的叫聲。和鄧肯（Isadora Duncan）結了婚的葉賽林，在四十二號街和百老匯的葉賽林，套着靴套，戴着禮帽的葉賽林——一個多麼殘酷的戲弄呵！真的，不僅克留夫和克里訶夫，就是葉賽林自己也充分地意識了這種不調和。他訴苦着：

瘋狂的街道，

在顛覆，咆哮，震蕩，

直到日出，廣場的轟聲

籠罩着全市。

好像一個廢字迷失在破爛的小祈禱書裏一樣，

我也迷失在，彷徨在

這陳列窗與人們的綜錯裏。

我被柵欄圍住，  
但把身體丟在後面，我的靈魂  
願欣然跑到難忘地留在我的記憶裏的  
樹木繁茂的土地去。  
在這石的深淵裏  
我的微弱的悲歎無人聽見；  
這些石的建築物  
不需要我的幽靜的哀愁。  
倒不如坐在酒店裏直到天黑，  
坐在那小小的桌傍，  
陳列着酒的棚架底下，  
沉溺在煙裏，  
獨自，回憶我的故鄉，  
在那裏小小的杉樹是那般蜿蜒，  
在那裏那麼一個美好的月亮  
在夜裏航行。

俄國人以他們的新生活的“tempo”而自誇了。你覺得我們的 tempo 怎樣呢，不是很眩目嗎？真是眩目！對於有些人，確是難堪地眩目，特別是對於那些像農村少年葉賽林一樣地在俄國農村的東方的幽靜裏被養育出來的人。火車鱗鱗，汽車號叫，飛機軋軋，工場的煤烟遮蔽着太陽，文書挾，便帽，禮帽，斷髮，餐食桶，衝撞着，推壓着，擁擠着，急匆匆的；孔莫索姆爾（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員）前進着，大聲唱着國際歌——而這農村少年站在這一切的中間，茫然的，不勝羨慕的。他是怎樣地願意“捲起他的褲子，跟在孔莫索姆爾的後面跑”，但是他不能夠，他沒有力量，他跟現代的困惑的，苦悶的節奏不調和。不能陶醉於城市裏，他開始夢想着快樂的涅槃。他願意變得“沉靜而嚴肅”，他憧憬着“星的寂靜”，他夢想“迷失在俄國的無際的草原裏”，並且“愛着一切，毫無希求”。常常尋找逃避，他感覺得“在他自己的國家裏簡直好像是一個外

國人一樣”，而且連他所愛好的原野也不過是他的精神的“暫時的住所”。在他的一首詩裏，葉賽林描寫了一匹年青的駿馬和一架新的機關車的比賽。機關車勝利，馬疲倦而死。同樣，這匹年青的，野性的，有生氣的駿馬——葉賽林也覺到了他不能夠使他自己適應這個無生氣的機關車的時代；而昂然地把他自己碰死了。都市的 *tempo* 對於這個“俄國母親”的寂靜的平原和靜靜的河流的兒子是太難受了；他為許多內的和外的矛盾所苦，便這樣死了。

葉賽林的死，有些作家說，是象徵着農村與都市衝突的結果。但是，至多這祇是一部分地正確，因為如果在葉賽林的場合，兩種對立的文明，兩種相反的生活形式的衝突所產生出來的精神的矛盾是終於以自殺來解決的話，那麼，我們還有另一個農民詩人，獨洛寧（Doronin），在他那裏這同樣的矛盾却終於達到了健全的，調和的綜合。在獨洛寧

的詩歌中，樹林的颯颯聲和雲雀的歌聲，與工場的汽笛和汽車的嗚嗚聲美妙地混合着。不像葉賽林，他不在睡着的，家長制的，農村的俄國的腐爛的殘餘之前灑着眼淚。也不像克留夫和克里訶夫一樣，他並不恐怕耕種機會把一切的美和幽靜從鄉村的風景中掃去。反之，當耕種者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娛樂，或是當“水晶的建築物和水晶的工場在光和碧綠的海裏輝耀着”的時候，草決不會變得沒有那麼柔潤，樺木沒有那麼柔軟，果實沒有那麼甘美，鳥兒沒有那麼歡樂。不哀悼過去，這位農民豫感着農村文化與都會文化的最後的綜合。革命是注定了要除去這兩者的差異，填塞城市與鄉村之間的裂口，把農村引入全俄國的近代的，進步的，技術的再建中去。

## 新俄文學 與 新的富農

---

不管農村會不會如獨洛寧的詩的豫言或正統派的康閱立斯特的計劃一樣終於共產主義化和工業化，但有一件事情是確實無疑的——舊的農村正在消滅。徐徐地，堅定地，無情地，城市正在蠶食鄉村。不管政府的一時的政策如何，牠的終局的目的是很顯明的：都會化，工業化，社會化。牠的武器是很微妙而精銳的：耕種機，電氣，無線電，印刷物，論理。每年，許多的農村青年被分派到紅軍裏面去，而紅軍簡直就是一個民衆大學。年年，有加無已地，在城市裏被訓練了的，受了共產主義教化的農民們參入農村的主要的地位，參入蘇維埃，學

校，種種的地方官廳。

鈍感的，冥頑不靈的，農村慍慍不平地反抗着這個襲擊。牠抵抗着，但是牠終於屈服了——一點一點地，頑強地固執着古舊的和習慣了的東西，反噬着，暴亂地揮着拳頭，但牠仍然是屈服了。

農民會不會無限地而且在各方面都繼續屈服呢，是極其可疑的。不過，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了。十年的協同的教育而努力已經開始結着果實了。書籍，圖書館，報紙和電影確在浸入農村。對於近代的器械，近代的方法，和近代的利器已經有了比從前更銳敏的理解了。但是似乎教育也正在使階級鬥爭愈趨激烈。農民教育，事實上，是正在成爲一把雙鋒的劍。農民，特別是富農，變得更加開化了，所以他易於成爲更有階級意識和更倔強。覺到了在蘇維埃國家的組織內的自己的重要，他常常不肯跟着那比較少數的都市勞動者奏着第二提琴。他愈益囂張地而且執拗地

要求着對於他的生產物的適當的報酬。在文學中，富農是常常被描寫成機變的，黏性的，能變通的，偽善的，大膽的，決斷的。雖然他榨取農民，他的影響却有助於提高他們的文化的和經濟的生活。他使得一切都有生氣：他盛興工業；他創始種種於社會有益的計劃——灌溉，開墾，科學的肥沃法。司華克，在菲丁的有名的“Transvaal”中巧妙地被描寫着的富農，夢想把全地方電氣化。“娜婷……娜婷……”他對他的妻說，“你想我能不能夠把電氣輸入全地方呢？呃？”他的妻回答：“我覺得，司華克，祇要你下決心去做，你是甚麼事情都做得成功的。”在西斯珂夫的“奇異中的奇異”（Wonder of Wonders）中的另一個近代的富農，雖則他嘲笑康閱立斯特，自然是很客氣而小心地，對於農村的技術的和文化的進步也感到非常歡喜。他爲了政府的地方電氣化的成功，甚至願意寬恕布爾雪維克的無神論，而且向列寧的遺名表示敬意。同樣

地進取的，恣肆的，但是有能力的而又“努力地活動着”的富農，在科波夫（Korbov）的“身長長的卡迪亞”（Katia the Long）和“牝雞的話”（Rooster's Word）中，在茲立亞克（Tveriak）的“Na Otshibe”中，在卡波夫（Karpov）的“第五次的戀愛”（Fifth Love）中，以及在其他以農民為主題的最近的小說作品中可以看見。

這經濟的地進步的分子，富農，如我們所已經指出的一樣，遇着了社會的誹謗和法律的迫害。困難就是他太敏捷和剛邁了。用巧妙的詭計，用賄賂，諂媚，和可恥的陰謀，他鑽入農村蘇維埃，合作社，和其他的組織；他操縱選舉，以俾他至少一時地可以當選。富裕的，貪慾的，堅決的，這新的農村的資產階級，正因為他的突進性和融通性，遂當作對於農村社會化的整個的慘淡經營的計劃的一個重大的危險物而出現於蘇俄文學中。自然，他並非不受干涉。新的農村康因立斯特，新的農村青年，

新的農村教師就很堅決地反對了他。無論怎樣，在文學中富農差不多總是終歸失敗的。合作社，農村公社，蘇維埃終於把他掃蕩出去了。社會的善行大體上是勝利了。雖則小說中的這種勝利也許是近於願望而非盡屬客觀的描寫，然而這確有多少的事實的基礎：零落而悲慘的富農在今日的俄國農村中決不是一個希罕的現象。

新俄文學 與

## 農村的酵母

---

經濟發展的社會形勢的真正代表者，是年青的農村康閱立斯特，那新的青年他們代替了無知的，無規律的，根本無政府主義的蘇甫龍安得倫。蘇俄的作家是怎樣熱心地描寫着這些青年；他們是怎樣珍惜地詳述着表現農村生活的這種愉快局面的任何插話；當他們敘述農村中的孔莫索姆爾的集會，敘述關於農業方法，或耕種機，或自治團體的“最新刊”的書籍的那種生氣勃勃地熱烈的辯論的時候，他們是變得怎樣地抒情的；他們是帶着怎樣的自負詳述着新的勞動形式和青年間的戀愛呵！

在泊維爾·尼卓瓦伊 (Pavel Nizovoi) “的密迪機羅” (Mitiskino) 中，農民想到他的科學的園藝 (“依照一本書上的話”) 便覺得非常歡喜：一排排的青菜好像鐵路軌條一樣地筆直，蘋果樹的幹塗滿了白色塗料，櫻桃樹用支柱撐住着，等等……伊凡，這小說中的主人公，在黨裏面積極地活動着，在田野裏勤勉地工作着，教育着他的妹妹，進行着一個排乾這有害的密迪機羅泥沼的計畫。“我們一定要逃出這些泥沼，”伊凡比喻地說：“我看見過各種各樣的人，而且過過各種各樣的生活；我看見過而且聽見過許多的善事和惡事——於是我得了一個結論：農民的生活是非從頭到底地改變不可了。”在塞孚琳娜的小說“肥料”中，蘇甫龍的年青的兒子，在逃脫了白軍之後，跑到城市裏去。他的話是這小說中的最後的話：“農村是非改變不可了！”這是在一九一九年。農村是非改變不可了的這自覺，這時候在俄國已經成爲自明之理了。就是密迪

機羅的牧師，被伊凡所煽動，也這樣地叫道：“這是可惡的，齷齪的——我一定要了結牠。我要拋棄一切，然後走開去。我要在合作社裏找一個工作。”

在俄國小說裏面，變化着的農村生活中的一個最重要的要素，差不多常常是以前的紅軍兵士。他在經濟的和政治的戰線上鬥爭着。但是，他的主要的作用却是文化的酵母的作用。

“畜生！”在西斯珂夫的騷鬧的小說“奧格利佐伏村的戲劇公演”(A Theatrical Performance in the Village Ogryzovo) (譯註：戴望舒譯，載新羅斯短篇傑作集第二冊內，水沫版；傅東華譯，“村戲”，新建設版) 中的還鄉的紅軍兵士帕維爾·莫霍夫喃喃地怨言着，“如果你稍稍觀察他們一下的話，你就可以知道他們簡直還沒有被革命所觸及呀。這真是羞恥呵。”不再講甚麼地，他開始組織起劇團來。用一種極其談諧的筆調，作者描寫着編劇本，分配角色，上演，等等的事務在村裏所引起的騷亂。但是，在熟悉舊

農村的人看來，這篇小說已算是一個最可喜的啓示。農村竟想到了演劇，或電影，或學校（有許多表明這種被喚起了的興味的蘇俄小說），像甚麼“請勿在地上吐痰，”“在開演中請勿私下談話，”“在休息時間內請勿喧鬧，”之類的標語竟點綴在牆壁上了，單祇這樣的事實，已經是俄國農村中的可驚的文化的昂進之動人的證據了。

關於這個昂進的最現實的而又最令人相信的描寫，在卡波夫的小說“第五次的戀愛”中可以看見。在這裏，情節是以康閱立斯特塞爾吉爲中心而展開着，塞爾吉是剛從軍隊裏回來的，在那軍隊裏，他陞到赤色司令官的位置。不像蘇俄文學中的康閱立斯特英雄的一般模型，也不像把農村從惰性中激動起來的確切忠實的，高尚的，勇敢的，聰明的紅軍兵士，塞爾吉是人情的，太人情的了。他的缺點，從康閱立斯特的觀點看來，是很多的而且很重大的。第一，他不是真正地“貧”農家庭的兒

子；第二，他是那成了村中的有錢的富農的農民的教子；第三，他離開農村太久了，所以他對於混雜的農村生活的感覺變得遲鈍了；第四，他不能抵抗那時時的飲酒的誘惑，而且不能改掉那胡亂的而又無責任的戀愛的惡行。結果，不管他的聰明，雄辯，相當的教養，對於黨的原則的忠實的歸依，對於革命勝利的燃燒一般的信念，塞爾吉荒廢了他的工作，陷入了種種的難境，捲入了結果鬧得農村通信員被謀殺了的那場酒醉的喧鬧，而被逮捕，審問，以至定罪，直到後來發見了謀殺農村通信員的是真犯人村中的富農的時候，纔被釋放出來。

辯護士的演說對於蘇維埃生活的各方面提供了這樣一種細密的分析，把牠摘錄下來，放在這篇小論裏，也許不為失當吧。“市民諸君！”辯護人說，“你們看見坐在被告席上的人不是一個普通的市民，而是一個黨員，並且是一個非常積極的黨員——努力的蘇維埃勞動者塞爾吉·美迭維笛夫。這

就是爲甚麼對於這個案件應該特別注意地研究的理由……由原告所提示於諸君之前的這個事件的分析之謬誤，是在牠不是社會現象的辯證法的分析。原告把事實看做完全靜止的，而不在運動中，發展的過程中去細心研究；他並且忽視了這些事實所由發生的環境——這就是爲甚麼對於這個案件的說明是一面的而且是完全謬誤的。實際上，原告完全沒有考慮被告所處的社會的複雜性，當作自治體的勞動者的他們(被告)的發展，以及在現實生活中所見到的一切力量的錯綜……”

在全篇演說中，辯護人着重在被告是一個徹底地有主義的黨員，而且是一個受了訓練的紅軍軍人這一點。辯護人提及團體的中央部對於塞爾吉的讚賞，被告是團體中的一員，而且是在團體的贊助之下，一面服務紅軍，一面讀書的；他(辯護人)指出在農村中從事社會活動的極端的困難，以及塞爾吉在組織合作社，在建立學校，在吸收農村

教師到集團的工作裏來，在組織孔莫索姆爾和劇團，等等上的相當的成功。討論關於黨的工作在農村中進行的情形，辯護士使陪審官注意於康閱立斯特的農民與康閱立斯特的勞動者之間的微妙的區別，以及前者（康閱立斯特的農民）是怎樣不知不覺地墮入富農的態度。

回答原告所提出的康閱立斯特的細胞在塞爾吉的指導下沒有活動得很好，以及塞爾吉不能夠阻止他的父親在家裏釀酒的非難，辯護人使大家注意於某種情有可原之處：

“……無政府主義的要素在農村康閱立斯特的細胞內還多少可以看見；這個還沒有克服下去，這個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克服得了的。期望塞爾吉在半年之內把農村重新教育一遍，是不合理的。要把他的父親重新教育一遍，也是不可能的。一個人如果爲了這事而非難他，那這個人一定是完全不懂得農村的情形。在這一點上，塞爾吉是毫無

過失的！……把新生活輸入舊的農村，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在這裏，他們還是重視着“良好的舊習”。哦，就是在城市裏，新的思想也還是沒有完全勝利。那末，你對於農村還能夠期望着甚麼呢？在這裏，遵循着舊的習慣，人們還是爲了女人的原故而折斷彼此的肋骨。家釀酒使得這些鬥爭更加殘酷了……家釀酒和酩酊都是社會的遺產之有害的果實。飲酒的問題是不能夠從先入的道德的觀點來判斷的……”

辯護的最有興味的部分是關於家長制的農民家庭及其在蘇維埃生活中的反動的任務的討論。這是爲回答原告對於塞爾吉的性格的攻擊而發的。原告指出塞爾吉和一個女教師發生密切關係，同時又和另一個女子戀愛，於是便這樣地把他的職位所給與於他的特權爲不道德的目的而濫用着。辯護人的回答，措辭雖極婉轉，是非常聳人聽聞的：

“在原告的演說中，我特別爲一句話所驚駭了，這句話似乎是對於家庭的保守觀念的直接的產物吧：這句話就是說塞爾吉·美迭維笛夫和一個或兩個或三個女人同居，以致破壞了家庭，從而破壞了社會。他使得妻子們對於自己的丈夫不忠實了……在我看來，市民諸君，你可以跟十個女人同居。祇是你一旦有了兒女的時候，你得扶養他們！我們的法律關於這個問題有特別的規定。我們所要求於你們的，祇是你們得付撫養費。你們說，美迭維笛夫濫用了他的社會的地位……關於這個，你們可曾聽見有甚麼女人提起控訴嗎？沒有這樣的控訴。所以，這個問題是全然不應該提出來的。你們說他破壞了家庭和社會嗎？……請問他到底破壞了社會中的甚麼呢？簡直沒有破壞甚麼呀，市民諸君。也許這些事情祇是破壞了傳統的保守主義，家庭；但是家庭的破壞是不是有害的，這還是一個可討論的問題！”

“讓我這樣說吧：妨礙建設集團主義的經濟的一個障害物便是農民家庭！農民家庭是建築在私有財產之上的，澈底地個人主義的生產細胞，牠常常是自足的；在家庭內，父親是家長，所有主，而其餘的人——兒子，女兒，媳婦，妻子——祇是農場上的工作者，附屬物；他把他們握在掌中，而這使得家庭的財產更加鞏固了。但是兒子們，當他們一旦有了兒女的時候，常常脫離家庭，另立門戶；而當他們另立門戶的時候，他們，也像他們的父親一樣，成爲家長，所有主。在向集團主義的前進中跨過這些家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拿美迭維笛夫的家庭爲例吧。老人不滿意塞爾吉；塞爾吉不信上帝，他不娶農家婦，他在公共事務上花費了很多時間——這就造成了家庭中的不和。美迭維笛夫破壞了家庭。假使他專爲他家庭的財產而活動，假使他離開了社會的工作，假使他娶了一個善良的家婦，假使他相信上帝，那末，家庭的基礎便會依舊

不致動搖，而且還會從老美迭維笛夫的家庭中分出另一個堅固的，自足的農民家庭來。那末，你們就可以知道，構成家庭中的分裂的要素的，就是黨員和孔莫索姆爾。那末，這就是說，現在的家庭制度不適合於新的生活；這就是說，農村所尚未想到的新的制度應該開始形成起來。對於舊家庭的最有力的打擊就是我們關於結婚的新的觀念，對於結婚的宗教儀式和神祕性的排除。新的生活條件一定會漸次地把舊家庭破壞；集團主義的農村經濟會把舊家庭打成粉碎！從上面所說的看來，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就是，美迭維笛夫並沒有犯濫用他的社會地位的罪！”

這篇演說中所含的意義是很重要而遠大的。自然，就是在俄國，也並不見得所有的人，或甚至大部分的人，都贊成這種極端的見解。這篇演說祇是向未來的一個射影而已。但是牠在某種程度上

確是指示着一種完全現實的傾向。我們將臨着某種渺茫的，新奇的，不可思議的事物了。等到現在的革命所播到農村的土壤中去了的種子發芽，生長，結果實，那也許還要好幾年，好幾十年，甚至好幾世紀吧。但是當我們窺着未來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看到，在被旭日的光輪所環繞着的，遙遠的地平線的邊際上，

一個新的播種者  
在田裏徘徊；  
他把新的種子  
播到犁溝裏面去……

## 新俄文學 與 文化戰線

---

當作對於舊文化的頑強的一種反動，勞動者開始感到建設新的，“無產階級的”文化的強烈的慾望了。最初，這個慾望表現在極其怪誕的形式中；第一是外貌變更了。白領，柔軟的手，文雅的態度，都麗的衣服，溫和的談話成爲了資產階級傾向的表徵，不名譽和叛變的符號。污穢的手，無緣帽，皮短衫，重的長靴，粗暴的談話便是良好的無產階級的模型的標識。如在過去一樣，在現在，統治階級——這時是勞動階級——也在開着風氣之先，成爲了風氣的決定者。自然，結果是常常鬧出笑話來的。

關於這種傾向的一篇最好的遊戲文章是曹西欽珂的短篇“金齒”(Gold Teeth)(譯者註:劉忠譯,載“蔚藍的城”中,遠東版),在這裏,我們看見孔莫索姆爾格里沙·斯特賓赤珂夫爲了三個新的金牙齒是陷入了怎樣的狼狽。格里沙的困難是從他的口中脫落了三個牙齒的時候起的。“而且他也還是一個青年呢!……你要明白,短了三個牙齒,過日子也有點沒趣的……他不能夠吹口笛了。吃東西也感困難了。而且要啣紙煙於齒間也不可能了。講話的時候,發出噝噝的聲音來!茶從口裏流出來。”格里沙終於積下一些錢,走到牙醫生那裏去。牙醫生,不知道孔莫索姆爾團體的特別的偏見,在格里沙的口中裝了三個燦爛的金牙齒。這事在團體中引起了波瀾,使得格里沙非常不愉快了。“關於這事引起了紛紛的議論。他的同志們說,他從那裏學到這種 Nep 的派頭呢?幹嗎要這種資產階級的調子呢?一個平常的孔莫索姆爾口裏牙齒有窟窿就不能夠

吃東西嗎？”於是他們“在原則上”決定聲明金牙齒之鑲有足以危害康閱立茲姆和牠的理想，並且強迫格里沙把他的金牙齒捐作失業救濟金。

這種趨於極端的傾向，在藝術方面也同樣地表現出來。極端論者主張着，無產階級是一個要求對於過去行着革命的訣別的階級，牠不能夠而且也決不要恢復那曾經作過在歷史上還殘存着的社會制度的組織工具之用的美學的形式。牠必須立刻地，迅速地，毫不延遲地產生着新的內容，同時產生着新的形式。和過去的任何精神的交通都是危險而有害的。勞動者必須破壞舊的，而開始建設他們自己的文化，發展他們自己的藝術，培養他們自己的藝術家。

這一切合併起來，就造成了生活的一般調子的急速的低下，和對於社會的親和的無關心。自然，無產階級的勢利性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原因。實際上，革命，飢饉，和內戰並不全是養成

溫和性質的最好的學校，而且，奇怪的分枝在過渡和摸索的時期中是不可避免的。這個並沒有影響康閱立斯特對於新文化的終極的出現的信仰。舊的秩序，康閱立斯特說，自有其積數世紀之經驗而成的倫理和美學。但是新的秩序還沒有到來；牠正待產生着；牠正待從革命的鍛冶場裏鍛造出來。就是比較簡單的社會經濟的組織都還沒有修繕完備；就是在這裏，我們還遇到了許多的贅物，不遠的過去的可怕的紀念品。至於新的心理學和新的道德——這些也正在從革命的鍛冶場裏製造出來。舊的習慣，戒律，和傳統正在被破壞着，但是還沒有甚麼東西來代替他們。祇有實驗，探究，對於問題的不完全的解決。祇有最優秀的，最強健的，最堅定的纔能保持他們的視力不朦朧，纔能繼續向着更好的生活和更合於人情的道德前進。懦弱，神經質的，浮薄的，那些沒有充分的智力的根基的，便失了主宰，而在舊與新的不可測的渦流之

中被搖蕩，打擊，和破壞。從此便在一部分的青年中間發生了悲觀主義，絕望，自殺；從此便在其他一部分的青年中間發生了放浪主義和波西米亞主義。

我們在“共產主義大學生日記”中的青年學生詩人夏霍夫的場合中看見了這個，但他是一個貴族，一個在自殺中尋了出路的“三角形”的人。我們又在青年新聞家阿斯泰金中看見了這個，但他是一個頹廢的知識階級。我們後來又在葉賽林中看見了這個，但葉賽林是一個迷失在都會的環境裏的農民。可是，奇怪得很，這種絕望的心情不僅在年青的以前的貴族，知識分子，被除根了的農民中間可以看見；牠並且常常在青年康閱立斯特，青年無產階級作家，青年學生中間也可以看見。而且在他們的場合中，也似乎幻滅和絕望是不調和的結果。

例如，在阿列克賽·託爾斯泰的“蔚藍的城”中，

我們看見年青而敏感的內戰英雄，布志立洛夫，康閱立斯特的建築家而又是詩人，把他那對於美麗的都市和偉大而高貴的人種的燃燒一般的幻想在灰色的背景，俄國大街的愚鈍和卑微中打碎了。他瘋狂了；他犯了殺人放火之罪。因為他不能夠適應用“勞動和血汗”，用書籍，劇場，俱樂部，耕種機，和電氣來慢慢地改造的那種散文式的生活。他固執地懷着這樣的觀念，以為“……必得有一場爆炸，——把一切都毀滅了……拿火燄似的巨帚把一切污濁掃清……”格拉特考夫的“水門汀”中的可愛的康閱立斯特女郎波麗亞是這樣地為“輝煌的陳列窗和酩酊的酒店的盛宴，”為“藉着掠奪來自肥的惡徒們和吸血鬼，”而氣憤得不得了，她歇斯特里亞地叫道，“我忍受不住了……我不能夠理解這個，也不能夠證明這個是對的……我不能夠承認這個……我不能夠與這個一同生活！……”同樣地，在“共產主義大學生日記”中，我們看見了一個青

年學生，一個內戰時代的英雄的墮落。當他因為犯了不道德的行為而被召至學生會議之前的時候，他說了如下的話以作為他的自己辯護的一部分：“在內戰中，所有的血和污穢都成了詩……那時我們的腦子都是燃燒着的呀。……後來我們的頭上還在冒火，手上從機關鎗傳來的熱還沒散放完，我們便這樣地回到荒涼傾圮，破碎不全的城市和工廠裏來，動手建設一個新的世界，這時候，難怪我們中間的有些人喪失了勇氣，我們的頭腦也變得冷了下來。同志們，我們回到一個沈悶的，散文的世界中來了。在呼吸了大草原的空氣和火藥的氣味之後，我們中間的許多人都不能夠立刻領會散文的生活也自有牠的詩意。至於我個人，我是還不能夠領會。”

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蘇俄的新聞紙報道了可愛的而又有天分的無產階級的抒情詩人科立亞·顧茲列佐夫 (Kolia Kuznetsov) 的自殺，他

是正在他的創作的經歷開始的時候悲慘地把他的生命了結的。討論着他的死，蘇俄的批評家列列維奇（G Lelevich）說：“顧茲列佐夫的死是有重大的社會意義的事變。這曝露了在我們的文學青年的某一部分中間流行着的嚴重的病患。”所謂“某一部分”者，列列維奇無疑地是指那些看見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就以爲是在“復活了的”資產階級的前進的隊伍之前的無產階級的“投降”，而陷入一種絕望的感情的無產階級詩人，特別是那些屬於“鐵工場”一派的詩人。在郭洛特萊（Mikhail Golodni），獨洛郭依欽珂（A, Dorogohenko），施惠特洛夫（M, Svetlov）——所有的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員——的悲觀的詩歌中，我們可以看見在俄國的文學青年的某一部分中間流行着的“嚴重的病患”的真正危險和社會意義之更進一步的而又更近的證明。

郭洛特萊的下面一首詩就說明了這個：

但是我們，這麼華美，  
    這麼無憂，這麼驕矜，  
揚起我們的羽毛來炫耀，  
    好像愚鈍無知的孔雀一般。

代代——相傳，  
    我們祇在一個真理之前屈膝；  
對於別的真理，不能忍受  
    而加以惡毒的，卑劣的罵詈。

我們被胡亂的歡樂所迷住了。  
    唉，我們的笑是瘋狂的！  
我們祇知道玩弄言語，  
    那些使腦筋寒戰而癱瘓的冷的言語。

戀愛曾經甜蜜地歌唱過自由。  
    現在她悲痛地離了我們的平原。

而我們毫不感到後悔的痛苦地  
看着粗暴的，肉慾的放縱流行。

我們不能夠想。我們叫喊。我們衝擊。  
我們也能夠有一天會  
不顧周圍的瑟瑟之聲，  
來探測或估量我們這時代的冷清清的沉寂  
嗎？

這個“嚴重的病患”的另一個徵候，是在青年中間非常顯著的令人痛心的放浪主義的傾向。這個傾向在最近被蘇俄的新聞紙老實不客氣地曝露出來了。“我們常常是這樣的，”重要的蘇俄作家梭斯洛夫司基 (L. Sosnovski) 在對放浪主義的猛烈的攻擊中這樣地怨言着；“一定要到惡行已經大規模地表現出來的時候，我們纔開始注意牠，我們纔開始認真地去解決牠。然後開始一個大的運動，然

後鬧得天翻地覆。對於放浪主義也正是這樣的。到現在，我們纔開始談到對於極其荒謬的放浪主義的行動的最嚴厲的處罰。”在他的論文中，梭斯洛夫司基列舉了好些關於放浪的行動的令人痛心的事實：在哈科夫，十個男人強姦一個年青女子；在列甯格勒，三十個青年工人強姦一個工人學生；在諾瓦羅西斯克，一羣惡徒襲擊着孔莫索姆爾的示威；一羣青年男女，都是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員，計畫而且實行強姦一個年青的同志——女人們幫忙把她們的朋友灌醉，而且在強姦的時候，幫忙把她捉住。“這種暴行，”梭斯洛夫司基說“是在惡戲，歡樂，玩笑的精神中實行的。顯然地，這些青年們以為他們的行為是與革命的精神，無產階級的道德，關於婦女和她的權利的無產階級的觀念並不相矛盾的。”在這些犯罪中，梭斯洛夫司基看出了農奴制，婦女所處的奴隸的地位，把婦女不當作一個人而當作原是被自然創造出來的一個供男子娛樂的

玩具的那種陳腐的觀念之有害的痕跡。他嘲笑着由墮落的父代傳給年青一代人的歪曲了的英雄主義，廉價的唐瓊主義。特別可悲的事情，被驚駭了的梭斯洛夫司基固執着說，便是像葉賽林那樣的放浪者竟獲得了詩的靈光和許多的競爭者。把像葉賽林那樣的酒徒和暴漢放在臺座上，而讚美他，效法他，簡直是愚蠢以上了。非把他從王座上拉下來不可；非把他的有害的影響和使這些影響成爲有力的條件從生活中斷根不可。總之，照梭斯洛夫司基看來，在蘇俄非得有文化革命不可了。

關於這點，發表於“紐約日報”（一九二九年六月廿三日）的瓦特·杜蘭脫（Walter Duranty）的莫斯科通信是很可令人玩味的：“克里姆林的‘左傾’政策及其對於階級鬥爭的堅持，由今日的新聞紙上的幾則記事表明出來了。不僅事實，就連蘇維埃訪員的處理事實的方法，都是很有意義的。事情是這樣的，在列甯格勒的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內……

一個叫做達立洛夫的少年，對於生活感到厭倦，要求他的朋友施米爾羅夫把他一鎗打死。施米爾羅夫拒絕了，於是，一個孔莫索姆爾女郎亞立克山特拉·科瓦列立克，嘲笑着施米爾羅夫的膽小，拿起鎗來，向達立洛夫射擊，幾天之後，達立洛夫便在醫院裏死了。列甯格勒的裁判所把亞立克山特拉判處了三年徒刑，報告如下：亞立克山特拉的日記證明了她對於孔莫索姆爾的工作已置之不聞不問，而沉溺於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和文學。達立洛夫也是葉賽林主義的犧牲者。他拋棄了他的孔莫索姆爾的朋友，而追求着狐步舞和酒宴。”

在上面報告中所提及的狐步舞和酒宴，在文學中也反映着。我們在“共產主義大學生日記”裏面的吉吉和其他的“狐步舞女”中看到這個。我們在顧米列夫斯基(Lev Gumilevski)的“狗胡同” Dog Lane) (譯註：周起應，立波譯，“大學生私生活”，現代版)，中在馬拉西金的“右側之月中”，在無數其他的小說和戲

劇中，也可以看到這個。其中，“右側之月”為最有名。牠的出版引起了狂風暴雨一般的反響——在全俄國，在報紙上，在講壇上，在孔莫索姆爾和大學的集會上的辯論，檢討，和激烈的爭論。有的批評家把這篇小說當作對於俄國青年的不公平的而又近視的攻擊，當作卑劣的誹謗，猥褻文學，和反革命，而加以非難；其他的批評家却認為這篇小說是存在於青年中間的醜惡的傾向之最好的而又客觀的曝露。反響的狂熱竟使這篇在藝術上很平凡的小說升到重要的社會記錄的頂點了。

這篇小說的中心人物是一個屬於莫斯科的孔莫索姆爾團體的年青女郎。這女郎名叫達麗亞，是農家出身的。在這小說的開頭，我們看見，達麗亞，為革命所吸引，是怎樣地脫離她的家庭和嚴厲的農村的傳統，而跑到都市裏去。在都市裏，她變得這麼“革命”，這麼自由，這麼真正解放了，他在數年之內，竟和“二十二個不同的男子”發生了關係。

不僅如此，在都市的霧圍氣裏，達麗亞還發展了“教養”。她常常讀頹廢的，革命前期的詩人的作品，用化粧品和癡醉劑，飲伏特加酒，而且在她的房間裏開着美其名曰“雅典之夜”的小宴會。

除了達麗亞以外，還有其他的人——也一樣地墮落和粗野。這一羣中間的最可鄙的一個，是小猶太人的孔莫索姆爾伊沙依卡·契查勾克。他是淫猥的，愚蠢的，荒誕的，莽撞的，口裏老是那幾句陳腐爛調，口頭禪，和未經消化的共產主義的言辭。雖然在性的方面，是無能的，他卻嚷着“關於性的問題和自由戀愛”的流行的爛調。對於他的最大的攻擊就是他以小特羅茲基自命。“要領會他的思想的邏輯，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他是他所像煞有介事地稱爲‘國際的性質’的一切感情，一切思想，一切氣質的混合。”

顯然地，農村女郎達麗亞和猶太人伊沙依卡都是蘇維埃生活中的矛盾的傾向之犧牲者。離了

他們各自的故鄉的大地，他們都弄得漂流在外，追求着新的歸依。沒有新定的戒律和習慣使他們的危險的路程成爲安全。懦弱的而且在道德上又是不堅定的，他們兩人都陷入了漂蕩者所特有的那種不負責任的波西米亞主義。他們離開了他們的階級和種族的安身所，但是他們又不能夠在康閔立茲姆中找到一個完全的代替物。他們既不是資產階級，也不是康閔立斯特，既不是農民，也不是無產階級，既不是猶太人，也不是基督徒，他們是一切，他們是虛無，他們是波西米亞。

但是，我們不可過於誇張悲觀主義，放浪主義，和波西米亞主義的惡傾向的嚴重性和包攝性。在讀俄國報紙的時候，我們必須記住現在俄國人的自我批判的熱情，一種常常帶着多少的自責的熱情。個別的病症固然常常發生，不可忽視，但是這些病症到底還不足以成爲一種流行病的傾向。比懷疑和悲觀主義更甚，無產階級和康閔立斯特

青年的最深的病患，是字面的拘泥，對於“資產階級的”過去，對於牠的宗教，哲學，藝術，和道德的過於無分別的反抗，和對於共產主義的教條的過於狂熱的，無批判的，字面的採用之傾向。“這不是我們的音樂——不好的音樂——不好的音樂！”菲丁的“兄弟”中的青年康閱立斯特羅蒂這樣地說。這種少年的確信，與其說是比較少數的神經過敏和吹毛求疵的人的絕望，不如說是現在俄國人的一般的態度。祇有“我們的”音樂纔是好的音樂。直到最近，這種近視眼的見解還是為大部分的無產階級所共有。生活和事勢的必然歸結把這種態度大大地改變了。如在軍事戰線和經濟戰線上一樣，在文化戰線上，勞動者也開始覺到他們還知道得不夠，他們還得請教於專家。不再輕蔑地排斥舊藝術，無產階級終於覺悟到他們必須先精通牠，然後再努力超過牠。在他企圖獲得過去的文化的時候，他常常很幼稚地容易受騙，而且犯着可笑的錯

誤。本來是很宗教的，他直到現在還在創造着偶像和物神，所不同的，祇是現在，他不是有神像和聖物之前，而是在科學；科學的技術，科學的管理法，經濟的唯物論之前頂禮膜拜。他對於歷史的唯物論的理解常常是膚淺的；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應用也常常是荒謬的。

拿顧米列夫斯基的小說“狗胡同”中的學生主人公霍洛合林爲例吧——他是一個康閔立斯特，一個科學的崇拜者，而且自然是一個頭等的唯物論者。但是他的唯物論是粗雜而混亂的。他從淺薄的動物學的見地來評價最複雜的人間關係和心理的謎。“我們不承認甚麼戀愛，”他自負地說。“這祇是資產階級的事業，這是要妨礙我們的工作的！這祇是吃飽了飯的人的消遣！”他的格言就是“良好的健康和能率。”“規則的飲食；規則的工作，休息，和娛樂的時間；規則的同女人的關係——這就是最重要的！”不幸地，在熱情和憎惡，戀愛和嫉妬的

世界裏，在不可解的偏愛和直觀的戀慕，祕密的煩惱和個人的野心的世界裏，這麼一個簡單的公式是一定要使一個人陷入不幸的糾葛中的。實際上，霍洛合林也覺到了人生是比他的簡單的公式所估量的要複雜得多。他起先所認為自然的要求的東西，漸次地成爲了本身目的——遊戲，消遣，娛樂。他也覺到了這“露骨的肉慾”之路是非常溜滑的，以致他破壞了一個天真未鑿的女孩，使得她墮胎而死；他惹了花柳病，把牠傳染於他的愛人；圖謀殺人和自殺；便這樣從一個優秀的大學生和良好的康閱立斯特墮落得成爲了一個病態的而且反社會的人。霍洛合林終於得救，但這祇是對於善良的讀者的一點安慰而已。在這裏，引起我們的興味的，是這故事中的悲劇的要素。而霍洛合林的悲劇，顯然地，是呆板板地拘泥字面的結果，是當作新道德的指南的，完全被曲解了的唯物論的教義之幼稚的，武斷的，愚笨的應用的結果。

關於這點，一個更顯著的例證是塞米洛夫的小說“拉達立亞·塔波華”中的榴洛契嘉和亞力山特的慘劇。榴洛契嘉和亞力山特都是年青的，可愛的；兩人都是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員；兩人都力求着美滿而自由的結合；但是，因為無知，無經驗，和頑固的哲學，他們的生活終於弄得破碎支離了；榴洛契嘉受了無知的產婆所秘密施行的不成功的手術，現在，她要死在醫院裏了。亞力山特悲痛得差不多發狂了。

“同志，你們兩人原來是想結婚嗎？”醫生問。  
“哦，如果你不要小孩子，那是你自己的事。不過你，一個年青的康閔立斯特，怎麼可以把她送到無知的產婆那裏去呢？”

“但這並不是我——並不是我……”

“你是甚麼意思……並不是我？”

“這並不是我——不是我的孩子……”

“不是你的？可是你不是剛剛說過你們兩人快

要結婚了嗎？”

“我們——我們是……但這並不是我，”這少年遲鈍地堅持着。

亞力山特終於把這事情的始末通通講了出來：

“這是在一個小小的宴會上——這是偶然發生的。他自己親眼看見了這是怎樣發生的。”興奮的，恐怕人家不相信他所說的話，亞力山特痛苦地重覆着說雖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而且他親眼看見了，但他還是相信榴洛契嘉是愛他的，真正地！——而且他愛榴洛契嘉，而且，最要緊的，榴洛契嘉是一個自由的女人，他沒有權利禁止她，因為禁止是不對的；他，亞力山特·迪摩非夫，是一個孔莫索姆爾；所以他甚麼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禁止是不對的；他們還是熱烈地戀愛着；當榴洛契嘉病好了的時候，他們當然是要結婚的，但是禁止是不對的……當他們從宴會回來的時候，他甚至還安慰

了榴洛契嘉；於是在整整的一個月當中，他的榴洛契嘉哭泣着，變得憂鬱了，於是，沒有對他講一句話地，她跑到那個鬼婆那裏去……

“饒恕我……饒恕我！”榴洛契嘉帶着可怕的聲音叫着。

“一會兒，這個藍眼睛的少年被這個叫聲怔住了。於是他的臉癱攣着。跪在她的牀前，他把他的手放在榴洛契嘉的灰色的兩頰上，熱烈地低聲說：“但是你並沒有罪，你是一個自由人……記得嗎？我對你說過，你是自由的！我如果禁止你，那是不對的，可不是嗎？”

“救救她！……救救她！……”他突然叫了出來。但是榴洛契嘉已經死了。

可憐的亞力山特，不幸的榴洛契嘉——他們學了這麼多的關於“自由的女性”，“女性的權利”，“打倒隔世遺傳的嫉妬心，”的誇大的言辭，以致他們變得困惑而茫然不知所措了。從這裏便發生了

悲劇。

但是如我們在關於金齒的故事中所看見的一樣，突然的光明所齎來的困惑的效果，有極悲劇的半面，同時也有牠的非常喜劇的半面。讀一讀非丁的“兄弟”中那段關於俄國青年發見科學的描寫，是很有趣味的。教授亞塞尼·亞塞立維奇，非丁的小說中的一個人物，爲了要說明勞動者是怎樣無知地而且不分皂白地接受凡是貼了科學這個誘惑的鐵條的教義，講述了如下的插話：

“不久以前，”教授說，“我接了從學院打來的電話。‘是你嗎，亞塞尼·亞塞立維奇？我要替前天你在這裏演講過的這個團體問你一件事情……我的夥伴們叫我解釋給他們聽——我們在這裏發生了一個關於上帝的小小的討論。我們依據你的演講把握了他（上帝）是怎樣發生的，而且明白了他是不存在的。不過，你知道，我們這裏還有些人主張有靈魂。所以我答應了他們問問你，從科學的立

場看來，這到底怎樣講法。喂，喂！”他叫道，‘你聽得見我的話嗎？到底有沒有靈魂？’‘沒有’我從電話裏回答他，‘不必擔心，沒有這樣的東西。’‘那末我就這樣對他們講嗎？’‘你就這樣講好了。’‘好的，謝謝你！’他回答，‘現在事情弄明白了。我很抱歉，我攪擾了你的科學工作。再會。’”

許多人也許要嘲笑這位求科學家來解決人生最麻煩的問題的無知的青年勞動者吧。但是在俄國，這是一種健康的表徵。一個黑暗和蒙昧主義的國家，一個產生了拉斯普金（Rasputin）和波培多羅斯茲夫（Pobedonostsev）的國家，是頗能夠忍受一點科學崇拜的。聽着演講，而且討論着永遠的宇宙之謎的勞動者，以攪擾了一個教授的科學工作而覺得抱歉的勞動者，不管他們如何幼稚，是一種新奇而踴躍的人間。哦，——有的人也許要反對——但是科學正在成爲俗惡化。學院的聖堂正在被下流社會弄污着。照塞米洛夫的“拉達立亞·塔

波華”中的技師的話講起來：“知識的性質是這樣的，牠常常是在少數人的手裏。知識是不可分的。牠不像資本那樣可以在許多人中間分配，而牠的總和還是依然不變。每人知道一點，則知識的總和就變少了。”

也許。也許這傲慢的技師是對的吧。但是在他的議論中至少有些謬誤的地方，因為，不像資本那樣，知識從教授的豐富的貯藏所裏被蠶食，決不會減少教授的貯藏。知識是一種源源不絕的流出物；牠甚至愈流愈多。

技師把腦和手分而爲二，是非常牽強的，是他的貴族的偏見的殘屑，是“我”對於“我們”，知識階級的自我對於羣衆的反抗。技師自然憤恨勞動者的這樣的叫喊：“我們就是時代！我們就是一切！我們是過去的幾千年。我們是人類宇宙的總和。我們就是未來！……看……你看見那裏的工廠嗎？那個工廠——是你呢，還是我們呢？”“是我，”技師認

真地回答。“不，是我們，是我們！”——勞動者勝利地叫着“那牆上的每一塊磚都有我們的手的痕跡。牠的高處的每個圓形都是由我們的勞動測量的。工廠是一件東西——所以，這就是我們！世界是由許多東西和我們而成的！這個世界上，哪一件東西不是捺着創造這東西的手的印跡，請你指出來看看吧。一切消滅了的東西，一切存在的東西，一切將要存在的東西——一切的東西都是我們的勞動，力量，能力，都捺了這些手的印跡……”“可是這腦子，”技師反駁着，指着他自己的前額。“哈——哈——哈——，”勞動者大笑起來。“腦子嗎？你的知識嗎？……凡是海綿都能夠吸水。我們也有腦子呢！”

在這種集團的誇耀中，在這種“我們也有腦子呢！”的言語中，有着浪漫司。但是，如我們前面所說的那樣，舊時代的個人主義者祇能夠理解獨奏；他祇能夠讚賞“名角。”和諧，交響曲的演奏，四人

合奏的歡騰，於他是無緣的。看看羅蒂的資產階級的妻子，在她談及康閔立斯特的時候，是怎樣地譏刺吧：

“我跟你愈住得久，我愈覺得厭倦，”她對她的丈夫說“我一聽見你重覆着別人的話，我就生厭……你們康閔立斯特老是好像雞要生蛋那樣咯咯地聒絮着。而你也跟他們一樣咯咯地聒絮着；甚麼兒童應該依着生產過程的路線來教育哪；甚麼童話是迷信的殘餘哪；甚麼宗教是民衆的鴉片哪；甚麼伏爾加河流入裏海哪。天呵，多麼討厭呵……”  
(菲丁的“兄弟”)

再看看愛蓮堡在描寫康閔立斯特勞動者亞鐵姆的時候又是怎樣地譏刺吧：他說，亞鐵姆的“富裕，像新時代大多數人一樣，是由我們所稱爲‘個人生活’的那種東西的顯然的又很可怕的缺乏而形成的。”……“講到他，”作者訴苦似地說，“我們就不能不講到會議，講到對匪患的鬥爭，講到蘇維埃

工業的再建，講到你所歡喜的一切事情，祇除了那些給與任何小說以生氣的栩栩如畫的場景……好的康閱立斯特，我們敢說，實在是沒有甚麼自傳的。而亞鐵姆確是第一流的康閱立斯特。他的感情和行動與其說是由黨的指令所左右，不如說是由那雖不在言語中表現，但是可以覺到的集團的意志所左右——由那把螞蟻堆成山堆，使鶴在三角形的隊列中飛着，促進巨人一般的建物和人間的新社會組織的那樣的意志。祇要知道一個事實和十個康閱立斯特對於這個事實的態度，就足夠了，我們就可以知道第十一個康閱立斯特的態度了，在這個場合，這第十一個就是亞鐵姆……他自然是“時間聯盟”的最初的聯盟員之一，爲了狂熱地宣傳時間的節省，而浪費了不少的時間。但我們不要以爲他是一個完全開滿了的機器。不止一次，他聽見街頭風琴的那好像從氣管裏發出來一般的音調，便感到一陣神祕的刺戟，而不由得離開他的書

本。每當他看見許多小孩子在郭歌爾像傍做着戰爭和執行死刑的遊戲的時候，他就感到一種想要走過去摩摩他們的毛髮蓬鬆的小小的頭的極強烈的欲望，但是他覺得表示出他的粗拙的溫柔來，是怪難為情的。他歡喜晴和的天氣，馬上的馳驅，和水仙花的芳香。隔世遺傳的衝動在這個年青而健康的男子的心中是非常有力的。至於戀愛——他認為牠是一種不會比聖靈懷胎或柏拉圖的宇宙論更現實的神話，一種和演着奇蹟的聖骨一樣地應該排斥的神話。但這並不是說他是禁慾主義者。棲息在中歐的風土之中而又沒有受酒精和麻藥的刺戟的普通人的那種適度的但是明顯地可以感到的性的要求，有時也會使得他和女人們在一起。在這種時候，他是很冷靜而嚴肅的。他厭惡猥褻的戲言。他不曉得接吻的言語！……他從沒有想念過他的臨時的女朋友。在另一方面，他是一個優秀的同志。同在聯隊裏一樣，在學院裏，他也結交了許多

忠實的朋友；爲了他們的原故，他常常這麼簡單而自然地冒着生命的危險，好像他是在犧牲着一塊糖或一根紙煙一樣”。

對於亞鐵姆的這種描寫是非常概念的。資產階級的作者沒有和康閱立斯特的勞動者融合爲一。他祇是想拿他的灰色的集團主義的特質來開玩笑，來和康閱立斯特的兄弟，一個春風滿面的，惡作劇的，冒險的，無責任的個人主義者而且自然也是一個魔高萬丈的惡漢對照。但是本質的特徵却被描寫出來了。從不同的方面去看，亞鐵姆的熱誠，溫柔，勤勉，和社會性也決不如愛蓮堡和菲丁所叫我們相信的那樣灰色。不管他們的偏頗的唯物論，在羅蒂和亞鐵姆中確有些令人愉快地健康的地方。

像奧格列夫的“日記”中的康閱立斯特大學生那樣的青年不跟在比較固定而安易的環境中的青年一樣把失戀看得那麼要緊，這是和蘇維埃的先

驅者的情形的全體調子完全相合的。當他的愛人跟着另一個人走了的時候，柯斯提亞反省着：“一個人最要緊的是要客觀地觀察自己。絲爾娃一走，我的生命便失去了一件大的，光明的，重要的東西。爲甚麼呢？我問過我自己千百遍。比絲爾娃好的女子有千百個，但是祇有絲爾娃是我最親密的朋友，而我讓她溜掉了……生活從我的身旁飛跑過去，而我一直是默想我自己……所需要的是行動，不是默想。一個人得起來戰鬥——爲了小事情而着急是不好的……讓牠滾開去吧——非克服不可的是生活！

“讓頹喪的反省也滾開去吧！”

“我必須工作，把我自己和我周圍的生活弄好；我必須成爲建設的，而不是默想的”。舊的俄國的英雄，哈孟雷特，除了默想以外，他們的精力再也沒有旁的出路了。“但是我的精力是有出路的”大學生叫道，“科學，社會主義，鬥爭！”

## 新俄文學 與 家庭戰線

---

從前面所說的關於達麗亞，霍洛合林，亞力山特，榴洛契嘉，亞鐵姆，科森季夫，和康閱立斯特大學生的事情看來，讀者一定注意了現在蘇俄青年所碰到的一個最困難的心理上的問題就是性的關係的問題。霍洛合林和亞鐵姆的趨於無味的實利性，自然不是一個解決。從多少年載積蓄下來的情感，關於戀愛的浪漫司和神祕和狂喜的光輪，過於有力地抓住了人間的想像。而且，純粹的實利性無補於健全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生活；而凡是觀察過俄國的情形的人，誰都不會否認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現在還是非常盛行的形式，不管離婚的數目

如何增加。固然，家庭變得比以前伸縮得多了，婚姻關係流動得多了，女性自立得多了，但是決不能夠因此就說一夫一妻制注定了滅亡的命運。霍洛合林那樣的“露骨的肉慾”能夠不發生墮落，軟弱，疾病，等等的結果，而成爲性生活的基礎的事，是差不多不能想像的。和這個反對，共產主義道德，照孔莫索姆爾塞尼亞（“狗胡同”）的話講起來，第一必須“服務於無產階級的鬥爭的利益！共產主義道德是一種以幫助勞苦者對搾取鬥爭爲目的的組織！共產主義道德的好處是在有用於革命，是在鞏固和保證共產主義的勝利。於革命有用的，就是道德的；有害的就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不容許的……”

這樣問題就發生了：墮胎，實利性，性的放縱，對於性慾的動物學的態度，是於革命有用的嗎？塞尼亞又回答着。

“從無產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看來，凡是挫折我們的鬪志，損傷我們建設新世界的意志，妨害

我們達到我們的直接目的的，就是不道德的！如果開始得太早而終竟流於性病的那樣的不規律的性生活損傷我們肉體的和精神的精力，毒害我們的意志，引導我們走入性的過度的邪路，那末，這就是不道德的……但是，自制，對於露骨的性的本能的誘惑的抵抗，對於所愛的女人的同志般的態度——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性關係的最高的模範——這就是我們的性道德的基礎……”

從初期的混亂和獸性和放縱中，革命似乎正在開始發展牠自身的道德律。大家都在切實地企圖用社會的壓力來補蘇維埃法律之所不及。戲劇，小說，詩歌，論文，和演講正在大量地產生着——而牠們的主要的任務都是在證明嚴格的共產主義道德之必要。

一九二八年夏季我在莫斯科的勞動者劇場所看的一個戲，便是一種對照的研究。在一方面，我們看見一個惡漢，他雖然很美貌，但他是一個不良

的康閱立斯特，一個唐瓊，一個無能的工作者，一個浪費家，一個強迫自己的妻子墮胎的不忠實的丈夫；在另一方面，有一個英雄——溫和的，沉靜的，熱心的，有為的，忠實的，他把惡漢的妻子和未生的小孩從惡漢的毒手裏救出來，他是一個模範的康閱立斯特。同樣的情節和同樣的道德的立場，可以在蘇俄劇本“赤銹”(Red Rust)，波格達洛夫(Bogdanov)的“最初的戀人”(First Girl)，布拉茲甯(Brazhain)的“交尾”(Leapt)，柯倫泰的“三代的戀愛”(Love of Three Generations) 譯註，沈端先譯，“戀愛之路”，開明版)，以及其他的作品中看見。

最後的道德的標準是革命的有用性。但是，假如你企圖以革命的効用性，以是否有益於集團主義的社會的發展為標準，而把這個苛刻的標準應用於任何特殊的行為，那你是一定要陷入難境的。假如塞尼亞和上述諸戲曲的作者達到了約束和節制是無產階級社會中的道德的必要物 這樣的結

論，那末我們在以農村為背景的卡波夫的小說“第五次的戀愛”中却看到了一種不同的觀點。在那裏，讀者一定還記得吧，辯護士堅持着說，被告塞爾吉美迭維留夫“以跟一個或兩個或三個女人同居而破壞了傳統的農民家庭，因而實際地服務了社會和共產主義革命”。在農村中“黨員和孔莫索姆爾構成了保守的農民家庭中的爆發的要素”，由此，他便達到了這樣的驚人的結論，就是，“現在的家庭形式不適合於新的生活”，“新的形式必須開始結晶起來”。新的條件和快要到來的“集團主義的農村經濟”會把舊家庭打成粉碎。

辯護士的在農村中“黨員和孔莫索姆爾構成了家庭的爆發的要素”的論調，在許多取材於農村生活的小說中充分地被證實了。

關於這個，一個最好的例證是羅曼諾夫的動人的故事“黑豆餅”，在這裏，我們看見農民安得列，一個康閱立斯特，離了他的妻兒，跑到城裏去，在

城裏，他讀書而且成了工廠中的重要人物，他並且和一個康因立斯特的女子發生了關係。安得列的戀愛事件的消息傳到了他的妻卡特琳娜的耳裏，雖然安得列還是經常地寄錢給她，但是她疑心安得列的大部分錢是用在一個“漂亮的”，“時裝的”城裏的娼婦身上去了，而怒不可遏。卡特琳娜，爲野蠻的嫉妬心所驅使，急匆匆地跑到城裏去，打定主意要丟他們的醜：“給人們知道他是一個棍徒，一個無賴……她要用空手打爛窗門的玻璃，以至於流血。她要扯去那個女人的頭髮”。

使卡特琳娜喫驚的，就是安得列看見她來了一點也沒有狼狽的樣子。他張開着手迎接她，溫柔的，親切的，撫慰的；而“那個女人”也祇是一個瘦弱的，憔悴的女辦事員，穿着破了的鞋子，很親切的，好客的，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有甚麼罪。卡特琳娜弄得無可如何了。她不懂得。她很奇怪，“他覺得她有甚麼好處呢？她的胸口平板板的”。漸漸地，她

的嫉妬消失了；無意識地她覺得安得列對於這個女子的態度是很可取的。他們三人是怎樣睡在一間房子裏，那個女子是怎樣替卡特琳娜鋪牀，卡特琳娜是怎樣想說一些有禮的話而終於低聲說，“爲甚麼這樣勞神呢？我可以睡在地板上的。”，讀到這些地方；真是非常令人感動。但是這篇小說的最令人感動的部分是卡特琳娜把她所帶來的一包黑豆餅送給那個女子。第二天早晨，安得列給了卡特琳娜一些錢，他和那個女子送她到車站。在最後的瞬間，嫉妬的波浪襲擊着卡特琳娜；她甚至躊躇着，好像要回轉身來。但是她想起了那個女子的瘦弱的手和她的困惑的，溫柔的微笑。在最後的告別中揮着她的手，卡特琳娜在身上畫了十字，便依着自己的路而走了。

但是不滿意的夫妻關係的解體並不完全是由男子開端的；這常常大半是由新解放的年青女子開端的，她對於她的人間的尊嚴的突然的自覺是

舊家庭的變革中的最重要的要素。這在農村中特別顯而易見，因為在革命以前，農村的婦女完全是處在男子的奴隸的地位。由於婦女的覺醒的結果，被多少年載的傳統所神聖化了的男性的優越權大大地動搖了。

農婦解脫了舊的夫妻關係的束縛，而宣布她的獨立。她再也不講甚麼貞操和服從了。丈夫弄得驚惶失措了：“雄雀啄着他的老婆；牡雞啄着他的老婆——那末爲甚麼非立摩洛夫不可以這樣做呢？這些新的風氣滾到地獄裏去吧！一個農民是一定要管轄他的老婆的！不這樣怎麼辦呢？如果你不打你的馬，牠會拉車嗎？如果你不打你的老婆，她會服從嗎？”（涅維洛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得倫”。）但是陸克麗亞，維里尼亞，和馬利亞們是不相信這種道理的。

“你不要對我叫，伊凡，”陸克麗亞對她的丈夫說。

“地板在伊凡的腳下滑落，屋子也好像顛倒了。他揮臂去打她。陸克麗亞抓住他的手臂：

“你再也不准打我了，伊凡’

“這男人怔住了：

“爲甚麼我不可以打你？’

“我受你的打受夠了，我們結婚六年了，我從沒有聽見你說過一句親切的話’。

“伊凡簡直無所措手足了：

“不，這不是他的女人，這不是他的結婚六年了的女人，這不是他的女人的聲音。自然，這是她的鼻子；她的雀斑，一點不錯，但是陸克麗亞已經不見了。站在他面前的，不是陸克麗亞——這是一隻貓！而她的眼睛都好像貓的眼睛一樣地燃燒着呀！”

優雅的，蒼白的，端正的，溫柔的，非常忠順的，女性氣味很濃厚的過去的貴婦人已經沒有了。普希金的達蒂亞拉，或屠格涅夫的麗莎，或託爾斯

泰的拉達莎，或柴霍夫的三姊妹到那裏去了呢？蘇俄文學中的新的女性是突進的，頑強的，任性的；她也能夠打仗，像她的男同志一樣，而且她還能夠開鎗；她聲音頗大，有點男性的氣味，她是非常積極的，而且“努力地活動着”。

看看涅維洛夫的女“布爾雪維克馬利亞”(Marya the Bolshevik) (譯註：曹靖華譯，載“烟袋”中，未名版) 中的馬利亞吧。她不聽她的矮小而易怒的丈夫的命令了。使得她的孱弱的丈夫大為狼狽，而且使得舊的農村充滿了說不出的驚愕，這位農婦學習讀書和寫字，積極地參加社會的活動，創立讀書班和“婦女部”，而且甚至被當選為村蘇維埃委員。“後來”，涅維洛夫敘述着，“我們到蘇維埃去看她。我們不認識她了。那裏她擺一張桌子，一個墨水瓶，兩枝鉛筆，一枝藍的，一枝紅的——一個書記拿着紙站在她面前。她迅速地看那些紙上的一行一行的字。‘這是’，她問，‘關於糧食問題的吧，葉列美

夷夫同志”

“是的’。”

“她在紙上簽了名，於是又像一個經理一樣地說，‘表弄好了嗎？趕快把牠弄好’。我們不相信我們的眼睛了。這就是我們的馬利亞！而她連臉都不紅一下”。當我們看見馬利亞離開她的傻丈夫而跑到城裏去的時候，我們一點也不覺得驚奇了。

從上面所說的關於結婚和家庭的話看來，這是很顯然的，革命在“家庭戰線”上所遇的困難是比在“經濟戰線”上所遇的還要麻煩得多，複雜得多。在這裏，障害物大都是心理上的。在精神上，一個人可以是一個忠實的康閔立斯特；但這並不見得可以使他不依着舊的傳統的模型。一個人的心理中的內戰是比在政治的和經濟的分野上的鬥爭更殘酷和吃力。在格拉特考夫的“水門汀”中，主人公格萊勃經過種種的困難而使工場復活，但是他却再也不能恢復他的舊家庭了。一個澈底的康閔

立斯特勞動者，他還在期望他的妻子達莎做一個舊式的女人——妻子，母親，廚役。但是達莎已經變了。三年間的黨的活動給了她一種不能消滅的影響。她在精神上自由了，而且在經濟上獨立了。達莎堅持着單一的道德標準。她坦白地告訴他她曾經和旁的男子，特別是和康閱立斯特伯丁發生過關係，而且逼着格萊勃承認在他離家的三年中間他也是不忠實的，也和旁的女子有過關係。

她的孩子死了之後，她爲了要當作一個自由的婦人，當作一個社會的和黨的工作者而毫無牽掛地活動着的原故，離開了格萊勃。格萊勃，這康閱立斯特，不能理解達莎之所以要離開他的動機。“但是有甚麼要了解的呢，格萊勃？”達莎說。“舊的達莎——我是再不能夠做了。僅僅做一個牀第間的妻子——我是不適宜……”

“我不知道，格萊勃，也許我從沒有愛過你……也許我……我愛你，格萊勃；這是真的——不過

也許我還愛旁的人……我不知道，格萊勃，一切都破碎支離了……戀愛也非改變不可了……”

格萊勃心裏難受極了——他對於佔有過他的妻子的那個同志，燃燒着一種“隔世遺傳”的嫉妬的感情。但是最後，格萊勃克服了他的嫉妬。在對於工場的復活的歡喜中，兩個敵人握手了。私人的事情沉沒在一般的事情，個人的事情沉沒在社會的事情中了。和格萊勃在經濟戰線上的勝利一道，有這兩個敵人在“心理戰線”上的偉大的勝利。因為他們兩人都覺察到“戀愛是非改變不可了。”

不管戀愛會怎樣改變，不管家庭會終於發展成一種怎麼樣的形式，在康閱立斯特看來，有一件事情是確實無疑的——舊家庭的複製品是不會產生的。公共廚房，公共洗濯所，託兒所，婦人的經濟的獨立，對於平等勞動的平等賃金，婦人教育，科學的生育節制，從家庭的爐邊到俱樂部，工場，合作社，講堂，方場，運動場和劇場的男女的生活重

心的轉換——這些一定會根本地影響夫妻關係。

如果一切其他的顧慮都沒有了，如果婦人完全解放了，康閱立斯特相信，結婚大概一定會發展成爲一種建築在深深的相互的愛力和單一的道德標準之上的完全自由的，肉體的和精神的友愛關係吧。這種關係，雖是絕對地自由，大概一定會比我們現在的“一夫一妻制的”結婚還要維持得久一點吧。牠一定會給與比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大部分買賣式的結婚所給與的更大的歡喜和更大的成就吧。

因爲照孔莫索姆爾寒尼亞的話講起來，“無產階級革命第一就是人間的個性的覺醒！革命，不管牠的方法的偶然的殘酷和無情，第一就是人間性的覺醒；牠的發展就是意味着對於人間的威嚴之尊敬之增大，對於弱者和最弱者的同情心的增大。革命如果不竭力幫助受着兩三重壓迫的婦女，不使她們沿着個人的和社會的發展的大道前進的

話，不能算做革命！革命如果不對小孩子加以最大的注意的話，不能算做革命：因為他們是未來的主人，革命是在他們的名義之下產生的……”

# 譯者附記

本書是從美國 Vanguard Press 出版的“十月之聲——蘇俄的藝術與文學”(Voices of October - Art and Literature in Soviet Russia) 中譯出，原書分六章，每章都是獨立的。第一章，“過去與現在”，佛里門(Joseph Freeman) 作；第二章，“蘇俄文學中的男女”，庫尼茲(Joshua Kunitz) 作；第三章，“蘇俄的演劇”，羅佐維克(Louis Lozowick) 和佛里門作；第四章，“蘇俄的電影”，佛里門作；第五章，“蘇俄的繪畫與建築”，羅佐維克作；第六章，“蘇俄的音樂”，佛里門作。

本書即第二章的全譯，作者庫尼茲是國際革

命文學突擊隊的一員，對於俄國文學有深遠的研究，著有“俄國文學與猶太人”(Russian Literature and the Jew)一書，並譯有蘇俄短篇小說集“蔚藍的城”(Azure Cities)。

在本書中，作者很巧妙地把反映在蘇俄文學中的各種典型的人物——“努力地活動着”的穿着皮短衫的鐵的男子，“自然的決定的態度”為“蒼白色的思想所蒙蔽”的哈孟雷特式的知識分子，愚鈍而頑固的農民，脫離了舊家庭和嚴厲的農村傳統的新女性，等等——一個個地陳列在我們面前，使我們不僅可以得到一個關於蘇俄文學的明確的概念，而且可以窺見在內戰和重建時期中的革命的光榮和苦惱。但是繼內戰和重建之後來了一個新的時期，一個“正在追上而且超過”全世界的最進步的國家的時期。這就是五年計劃實施的時期。五年計劃給了蘇俄文學以吸不盡的源泉，“描寫社會主義建設的英雄，”成為了現在蘇俄文學中的主要

的口號。本書是一九三〇年出版的，所以沒有提到社會主義建設，這是一個缺點，不，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上升的 tempo 太快了！

翻譯時曾參照木村利美的日譯，牠給了我不少的幫助，雖然牠也有好些謬誤和遺漏的地方。

蘇俄文學中的男女

定價一元二角

實價

譯述者 周起應

發行者 張鑫山

經售者 各省大書局

